

「以西南結西南」的嘗試與失敗： 以貴州政局變化為核心的考察 (1932-1935)

朱育鑣

摘 要

1932年元旦，寧粵重新合作，改組之後的國民政府於南京正式宣告成立。但兩廣方面卻成立了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兩機關，實際上仍處於「變相之獨立」。「西南兩機關」宣稱擁有指揮監督兩廣、福建、雲貴等省份的黨務、內政、軍政、財政、交通、實業、教育、司法行政等權力。此時，胡漢民企圖聯合各地實力派，打倒蔣中正及其勢力，徹底斷絕其再起之路。儘管蔣中正很快地聯合汪精衛再次復出，不過兩廣對各地實力派的拉攏並未停止。其中針對西南各省，胡漢民提出「以西南結西南」的口號，企圖將西南各省聯合起來，以對抗甚至推翻蔣汪合作下的南京中央。據胡漢民秘書王養冲晚年所言，西南各省當中除廣西外，以貴州最為親近廣東。因此，本文擬以貴州政局變化為核心，從中窺探兩廣與中央角力的另一個戰場，並探討為何以西南兩機關為架構的兩廣，最終未能成功與南京中央抗衡。

關鍵詞：以西南結西南、胡漢民、王家烈、猶國才

The Attempt and Failure of “Uniting the Southwest”: A Case Study of Regional Politics in Guizhou, 1932-1935

Yu-Biau Ju *

Abstract

On January 1, 1932, two rival National governments, in Guangzhou and in Nanjing, cooperated and established a united Nanjing Government. In response, the Liang-guang region (Guangdong and Guangxi) set up two separatist institutions, the “Southwestern Political Committee” and the “Southwest Executive Branch,” creating a *de facto* independent Southwest China. The two Southwest institutions, based in Guangdong, claimed that they had the authority in directing party, internal, military, financial,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education, and judicial affairs in the provinces of Guangdong, Guangxi, Fujian, Guizhou and Yunnan. They thus dominated and supervised those five provinces. Hu Hanmin, leader of the Southwest, tried to unite various regional factions in order to thoroughly defeat Chiang Kai-shek and prevent the restoration of Chiang’s leadership. Although Chiang Kai-shek soon returned to power with the help of Wang Jingwei, Liang-guang did not stop its networking with regional powers. Hu Hanmin proposed the idea of “connecting the southwest with the southwest” in an attempt to unite the provinces into a solid alliance so as to confront and even overthrow the Nanjing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reminiscence of Wang Yangchong, Hu’s secretary, Guizhou was the closest ally, besides Guangxi, to Guangdong at the time. This paper intends to focus on Guizhou’s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arly 1930s as the province found itself at the center of competition between Liang-guang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 also tries to explain why the Southwest

*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以西南結西南」的嘗試與失敗：以貴州政局變化為核心的考察（1932-1935）

initiatives eventually failed.

Keywords: Uniting the Southwest, Hu Han-min, Wang Jia-lie, You Guo-cai

「以西南結西南」的嘗試與失敗： 以貴州政局變化為核心的考察 (1932-1935)*

朱育鏞**

壹、前言

自1931年寧粵分裂後，雙方一度在湖南邊境上大打出手，但旋即因為九一八事變爆發而展開和談。最終在1932年元旦，廣州國民政府及非常會議宣告取消，寧粵雙方在南京合組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但在此同時，兩廣卻又成立了「西南政務委員會」與「西南執行部」兩個黨、政機構（以下簡稱「西南兩機關」），實行「變相之獨立」，¹甚至有學者稱此架構為「西南政權」。²西南兩機關號稱

* 本文曾以〈「以西南結西南」的嘗試：以貴州省為例的考察〉在「2019年中國現代史研究生工作坊」中興大學場次發表，承蒙評論人楊維真教授給予不少寶貴意見。此外，兩位匿名審查人亦給予不少修正建議，並揪出論文原先許多謬誤，特此致謝。另外，在修改過程中，得益於白先勇教授所提供的1935年《黃旭初日記》，對本文研究有相當大的助益，亦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27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年4月7日。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¹ 邵元冲著，王仰清、許映湖標註，《邵元冲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820。

² 陳紅民將以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兩機關為架構的政權型態稱為「西南政權」。筆者揆諸1930年代報刊資料及相關函電，多數人在提及兩廣政治局勢或兩廣政要自身皆

擁有指揮監督兩廣、福建、雲貴等省份的黨務、內政、軍政、財政、交通、實業、教育、司法行政等權力。³ 胡漢民企圖結合各地方實力派，以阻止下野的蔣中正再次復出，並徹底掃除蔣中正的軍事力量，因此，在西南兩機關成立前後，就試圖聯繫華北與西南各地實力派人物。雖然蔣中正很快地聯合汪精衛復出，不過胡漢民等人並未終止其行動，在這之後依舊不斷與各地方實力派有所往來，希冀爭取到各地方實力派的支持，以期推倒蔣汪合作下的南京政府，重新入主中央。而針對西南各省份，胡漢民則提出「以西南結西南」的構想。⁴ 因為貴州位於西南各省中心，地理位置重要，又與兩廣經貿密切往來，自然成為胡漢民等人為首的兩廣政要極力爭取的目標之一。據胡漢民秘書王養冲晚年所言，西南各省當中除廣西外，以貴州最為親近廣東。⁵ 因此，本文擬以兩廣與貴州的關係為核心，從中窺探兩廣與中央在貴州的角力，並探討何以兩廣最終未能成功與南京中央抗衡。

常以「西南」稱之或自稱；此外，筆者發現同時期日本的相關檔案，亦稱其為「西南派」或「西南政權」。因此陳紅民的「西南政權」說似有相當道理，但筆者認為稱其「政權」可能仍有待商榷；且因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全名為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因此在理論上，這兩機關仍隸屬南京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之下，不宜稱其為「政權」。陳紅民，〈胡漢民·西南政權與廣東實力派（1932-1936）〉，《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1期（2007年1月）。

³ 〈廣州三機關產生經過·粵府撤銷時之特殊舉措〉，《大公報》，天津，1932年1月19日，版3。

⁴ 胡漢民晚年在與西南各省地方實力派的往來函電中，曾多次提及「以西南結西南」的必要性，如胡氏在1932年6月9日一封給四川省主席劉文輝和貴州省主席王家烈的信中就提及：「今寧中當局所以謀分拆我西南者，其唯一方策在以西南制西南。弟則反之，以為唯有以西南結西南，始足以確實齊一西南各省之步驟，以自保此乾淨土，亦即未〔為〕來日推進大局也。」見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3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441-442。

⁵ 王養冲晚年接受陳紅民訪問時回憶道：「廣西與廣東聯在一起，人稱『兩廣』，當然關係最親近。貴州王家烈也常與胡先生聯繫，他的一個財政廳長叫鄭先莘〔辛〕，給我們寫過不少信。王家烈的夫人更是常駐兩廣，因為兩廣是貴州物資的進出口，不能不搞好關係。湖南何鍵到過廣東。雲南龍雲關係遠一點。四川連續內戰，根本就不統一。所以如果粗略地把各省排個隊，由親而疏大致是：桂、黔、湘、滇、川。原先福建走得也比較近，可閩變後大家分道揚鑣，福建完全被蔣介石控制。」見陳紅民，〈秘書眼中的胡漢民—王養冲教授訪談〉，《檔案與史學》，1999年第2期（1999年3月），頁50。

關於1930年代兩廣與中央關係的研究甚多，但較少關注兩廣與其他地方實力派之互動，特別是與西南川滇黔各省的關係。就筆者所見，目前的探討多集中於兩廣與華北實力派的關係，代表著作如陳紅民〈從攻擊到拉攏：胡漢民對張學良策略的轉變〉、〈神秘的組織——“新國民黨”研究〉、〈友乎？敵乎？——兩廣與福建事變關係論述〉等文。⁶ 陳氏對胡漢民所遺留、後為其女兒胡木蘭捐贈給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的大量函電稿進行過整理（後來集結成《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共十五冊），⁷ 且對胡漢民企圖拉攏馮玉祥、方振武、孫殿英、張學良等北方實力派及十九路軍等做過詳細考查，對筆者此文頗有啟發。惟陳氏對於兩廣與距離相對較接近的西南川、滇、黔各省之互動卻幾乎沒有涉及，不能不說是非常可惜。且陳氏的研究絕大部分都使用胡漢民方面的史料，較少使用臺灣方面相關的檔案。又如楊天石的〈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蔣胡和解〉、〈一項南北聯合打倒蔣介石計劃的夭折——台灣所藏閻錫山檔案一瞥〉、〈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初期國民黨內部的反蔣抗日潮流〉、〈一九三五年國民黨內部的倒汪迎胡暗潮〉等文章，對於胡漢民等人試圖與華北實力派等合作倒蔣的行動也有相當豐碩的成果，卻也無甚提及兩廣與川滇黔等實力派的互動，且對臺灣方面的相關檔案應用仍稍嫌不足。⁸ 另外，羅敏的專書《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係研究（1931-1936）》所涉及的範圍較廣，對於兩廣與中央有更為詳細的研究；⁹ 除了使用中國大陸方面的典藏史料，也大量使用臺灣方面的相關檔案，以及《蔣中正日記》和《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等史料，對於中央軍入黔前後，兩廣與西南各省的局勢變動，有頗為精彩的討論，但是對於兩廣與貴州在中央軍入黔以前的互動，則尚有可探討的空間。另外，蕭自力的《陳濟棠》指出陳濟棠曾在1934年1月提出「西進政策」，也就是拉攏雲貴實力派來對

⁶ 以上幾篇文章皆收錄於陳紅民，《函電裡的人際關係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⁷ 陳紅民，《函電裡的人際關係與政治》，緒言I。

⁸ 以上幾篇文章皆收錄於楊天石，《海外訪史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

⁹ 羅敏，《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係研究（1931-193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144-151、154-166。

抗中央，並在7月正式推動該計畫。¹⁰近年來臺灣亦有一些相關研究。如王宏松在其碩論中指出，閩變被平定後，陳濟棠感受到中央的壓力，曾試圖聯合西南各省反蔣。其中關於陳拉攏湖南何鍵，並對中央軍入黔前後的政局變化有詳細的分析；¹¹其博論則指出，原先較親蔣中正的劉湘自1934年後，因與蔣的關係逐漸生變，亦與兩廣有相當往來。¹²王氏之論文中涉及到該議題的相關部分，雖然篇幅不多，卻給予筆者不少啟迪，惟對於兩廣與貴州實力派之間的互動卻幾乎沒有涉及。此外，池炫叡的碩論〈貴州中央化（1926-1935）〉則是臺灣近年來對貴州政局較為詳盡的研究，談及甚多王家烈主政時期貴州與兩廣的互動，亦令筆者獲益良多。¹³

本文除了利用陳紅民於2005年編輯、解讀後出版的十五冊《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外，也使用臺灣方面的相關檔案，如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文物》、《國民政府檔案》、《閩錫山史料》，並輔以各種報紙、《貴州文獻》、文史資料、日記及相關的研究成果等，來探究兩廣與中央在貴州的交鋒。

貳、周西成以降的貴州對外關係大略

貴州處在中國西南地區，地理位置遠離中央政治中心，周圍環繞四川、雲南、廣西、湖南四省。民國建立之後，由於政局紛擾，如何處理與鄰省和中央的關係，成為貴州歷任主政者必須審慎面對的問題。1926年，周西成上任貴州省長，由於周氏為桐梓縣人，他所重用的將領也多為桐梓人，由於之後的貴州主政者皆出自周西成的部下，因此貴州在往後十年間（1926-1935）也被稱為「桐梓系」的派系所主導。

¹⁰ 蕭自力，《陳濟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92-194。

¹¹ 王宏松，〈蔣中正與粵系二陳（陳銘樞、陳濟棠）關係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223-229、238-246。

¹² 王宏松，〈「中央化」的詮釋、實踐與挑戰：以蔣中正對四川的處置為例（1927-1949）〉（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年），頁118-123。

¹³ 池炫叡，〈貴州中央化（1926-1935）〉（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相較於周西成的桐梓系，之前即活躍貴州的「興義系」¹⁴與雲南的主政者唐繼堯關係較為緊密，兩省在政治、軍事等行動常保持一致，例如護國之役、護法之役等，貴州都與唐繼堯保持密切行動。然而，周西成上台的隔年，雲南爆發由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四鎮守使發動之「二六政變」，迫使唐繼堯交出政權，不久後唐抑鬱而終。¹⁵隨後雲南陷入胡若愚、張汝驥與龍雲之間的內戰，周西成也介入其中，組織「援滇黔軍」，支持龍雲的對手張汝驥、胡若愚，而龍雲也支持周西成之政敵李燊¹⁶，滇黔關係一時交惡。¹⁷周氏遂一改過往貴州親滇的態度，轉而接近兩廣。周氏多次派盧燾¹⁸到廣州結好當時的第八路軍總指揮李濟深，並取得了良好回應，從李處獲得步槍四千餘支、子彈一千萬發及大型無線電台一部。隨後，周氏又派出參謀長劉民傑到南寧，與桂系李宗仁簽訂「黔桂聯盟協約」，此後雙方代表往來頻繁。¹⁹周西成為了擴充實力，還連年統購集運大批鴉片到廣東出售，以換取槍械，與桂系過從甚密。²⁰

相反的，周西成對於中央卻多方抗拒。由於當時黔籍中央政要何應欽、王伯

¹⁴ 興義系，指以劉顯世、王文華、袁祖銘等人為核心的黔系軍人集團，其主要成員皆為劉的血族姻親或門生故吏，如王伯群、王文華兄弟為劉之外甥，何應欽之妻為王伯群之妹，何輯五為何應欽之弟。張志韓，〈何夫人王文湘女士行誼〉，《貴州文獻》，第11期（1986年1月），頁40。

¹⁵ 楊維真，《唐繼堯與西南政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頁196-201。

¹⁶ 李燊（1889-1930），字曉炎，貴州省貞豐縣人。原在劉顯世帳下，後調入袁祖銘部，原為連部司書，袁祖銘勸其學習，漸有謀略，累積戰功，不斷升任至軍長。北伐後，國民政府給以第四十三軍番號，李任軍長，駐防鄂西。王俯民編著，《民國軍人志》（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頁184。

¹⁷ 楊維真，《從合作到決裂——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1927-1949）》（臺北：國史館，2000年），頁54-63。

¹⁸ 盧燾（1881-1949），字壽慈，原名亮疇，貴州壯族人。早年加入同盟會，後由雲南講武堂畢業。歷任黔軍團長、旅長等職務。1920年，貴州「民九之變」時，曾代理黔軍總司令，後正式接任。1921年，孫文委任盧燾為貴州總司令兼省長。1922年，袁祖銘組織「定黔軍」回黔，盧即引退。1924年，盧勸唐繼堯、袁祖銘和平解決爭端，由彭漢章回黔主政。王俯民編著，《民國軍人志》，頁89。

¹⁹ 王家烈，〈貴州桐梓系軍閥與新桂系軍閥的關係〉，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西文史資料》，第九輯（南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1年），頁92-94。

²⁰ 王亞明，〈如煙往事念李燊〉，《貴州文獻》，第6期（1980年2月），頁14。

群等，皆出自興義系，與劉顯世也都有親戚關係，且先前在黔與周有過節，致使周對中央態度疑慮。如對中央派往貴州的黨務人員先是多方壓制，其後由於北伐順利，國民黨聲勢如日中天，周氏體認到已經不能再繼續抵制國民黨成立黨部了，索性自組省黨部，自任主席，並對中央派來的黨務人員多所抵制。甚至爆發「密電碼」事件，要求來黔的國民黨黨務人員張道藩、商文立、黃宇人、李益之四人交出與中央聯繫的密電碼，遭到拒絕後，周竟將四人逮捕，並且嚴刑逼供，其中李益之甚至被周殺害。後經貴州籍國民黨元老平剛出面協調，張道藩三人才終獲釋放。但三人不久後都陸續離開貴州，中央在貴州省建立國民黨黨部的努力失敗。張回南京後，還就此事件寫了一本《密電碼》劇本，後來還被翻拍成電影。²¹周西成與中央關係之惡劣，由此可見一斑。

1929年3月，李濟深在南京被扣留，蔣桂戰爭爆發，周西成先是去電中央：「李任公追隨鈞座，歷有年所，不無微勞。今因到京開會，即被扣留。縱使鈞天沉醉，冤雪紛飛，而公道在人，將何以杜天下悠悠之口。」之後蔣中正要求西南各省出兵討伐桂系，粵、川、滇、湘等省皆響應中央號令，唯有周西成非但不出兵攻桂，且懷疑蔣暗助李燊重返貴州取代自己的地位，遂決定孤注一擲，出兵助桂。但周西成於5月在與李燊交戰時陣亡，李率軍進入貴陽，短暫的擔任省主席。²²

因為周西成生前訂下「群、紹、佩、用」（分別取其部下毛光翔、王家烈、江國璠、猶國才的字）的接班順序，周死後，第二十五軍遂擁護其妹夫毛光翔出掌軍長。當時，龍雲因為張汝驥、胡若愚率軍進逼昆明，趕緊將黔中滇軍抽調回滇。在失去滇軍的協助下，李燊自覺無力單獨對抗第二十五軍，也跟隨滇軍撤走。因此，桐梓系得以重新控制貴陽，掌握貴州省政。²³毛光翔回到貴陽後，組

²¹ 陳明仙，〈我所知道的國民黨貴州黨務〉，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33；池炫叡，〈貴州中央化（1926-1935）〉，頁27-30。

²² 陳進金，《機變巧詐：兩湖事變前後軍系互動分析》（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64-268；王家烈，〈貴州桐梓系軍閥與新桂系軍閥的關係〉，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西文史資料》，第九輯，頁95-96。

²³ 周素園，〈貴州陸軍史概要〉，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

織臨時政務委員會，中央也派李仲公²⁴、何輯五（何應欽之弟）到貴州善後。²⁵ 蔣中正原先希望讓李仲公出任省長，與龍雲、毛光翔等人聯合商討，籌組貴州省政府；但因張發奎突然在鄂西反叛中央，蔣中正為爭取貴州支持，決定直接由毛光翔接任省主席，令毛出兵截堵張部，毛也趁此機會將許多李燊舊部調出省外。²⁶

鑒於周西成的失敗，毛光翔上台後，改採較為親近中央的態度，接受周生前一直抵制的中央在貴州的黨務發展，甚至讓中央在第二十五軍設立黨務特派員。周生前向廣東訂購的四千支槍，尚有兩千支未交貨，毛也去電聲明不再續要。²⁷ 對同一年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蔣行動，毛氏亦在報上通電支持中央。²⁸ 當時桂系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等因處境困難，多次派代表來聯繫毛光翔，毛也置之不理。²⁹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儘管毛光翔也派出代表到北方與閻錫山有所往來，甚至報紙上多次傳出毛氏與反蔣派聯合的消息，但皆遭毛否認，且毛也確實沒有實際反蔣的行動。後來毛光翔甚至與劉湘、龍雲共同簽字，宣示川滇黔三省合作，擁護中央討逆。總體而言，在中原大戰期間，毛光翔的態度仍是較傾向中央的。³⁰

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61年），頁37-38。

²⁴ 李仲公，生於1888年，貴州貴築（今屬貴陽）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歷任貴州省定縣知事、貴州省政府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交通部政務次長、貴州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等職。1934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員。1935年，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貴州省政府財政廳廳長。〈李仲公〉，收錄於「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查詢」，<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result.php?peopleName=%E6%9D%8E%E4%B%B2%E5%85%AC&searchType=1#1>（2020/2/27點閱）。

²⁵ 張鏡影，〈周西成傳初稿〉，《貴州文獻》，復刊第5期（1978年2月），頁5。

²⁶ 池炫叡，〈貴州中央化（1926-1935）〉，頁43。

²⁷ 王家烈，〈桐梓系統治貴州的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貴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63年），頁19。

²⁸ 池炫叡，〈貴州中央化（1926-1935）〉，頁44。

²⁹ 王家烈，〈貴州桐梓系軍閥與新桂系軍閥的關係〉，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西文史資料》，第九輯，頁97。

³⁰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263-275。

中原大戰結束後，南京中央威信日趨鞏固，但1931年2月底，湯山事件爆發，蔣中正因囚禁黨國元老胡漢民，使原先支持南京中央的廣東打出了反蔣旗號，兩廣也重新修好關係。5月份，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成立廣州國民政府，形成「寧粵分裂」的局面。寧粵雙方且一度在湖南邊境發生激戰，但因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而走向和解。雙方派出代表到上海會談，其後決定各自召開四全大會，再合組為統一的國民政府。而蔣中正在此過程中也被迫辭去本兼各職下野。1932年1月1日，當寧粵應該走向統一之際，兩廣卻宣布成立西南兩機關，以繼續維持「非常會議」與廣州國民政府時期的體制。³¹

寧粵分裂時，兩廣曾經派盧燾入黔拉攏毛光翔，但毛最初並無任何表示，反而在報上通電支持南京。不過，由於這時王家烈企圖倒毛的跡象已經很明顯，且王氏長時期結好何應欽、何輯五、李仲公等黔籍中央政要，較毛更受中央重視，並不斷得到來自中央補給的費用與武器，讓毛有芒刺在背之感，因而改變了對兩廣的態度，開始與兩廣有所來往。毛暗中匯款三十萬到廣東，打算從廣東買取軍械，以對抗王家烈。³²

以上是兩廣成立西南兩機關以前貴州對外關係的大致狀況。

叁、兩廣對王家烈的拉攏

一、毛王之爭與兩廣

在西南兩機關成立之初，毛光翔即派代表陳養初前往香港，與胡漢民會晤。胡漢民透過陳向毛傳達：「此次在粵諸同志，根據四全大會及一中全會之決議，而有西南執行部、政委會、軍分會等三組織，師法遺教，將以謀西南之建設，促國家之統一。抑就事實言之，以西南諸省地理、經濟關係之密，固結一體，更不

³¹ 陳紅民，〈胡漢民·西南政權與廣東實力派（1932-1936）〉，《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1期，頁20-21。

³² 池炫叡，〈貴州中央化（1926-1935）〉，頁55-57。

容緩。黔省屏障西南，密接滇、桂，唇齒之間，相需猶切。甚望轉達群麟（毛光翔）先生，共策進行，不特西南之幸，亦國家之福也。」³³從中可見胡漢民希望團結西南各省，進行跨省份之間的連結與建設。貴州因地理位置重要，胡尤其希望毛能贊同自己的理念，加入兩廣陣營。

不久，貴州政局大變，王家烈在歷經長時間的醞釀後，於1932年2月4日率軍向貴陽進逼。由於得不到有力支持，5日，毛光翔在王家烈優勢的兵力進逼下，被迫辭去第二十五軍軍長職務，並且在26日的談判中，允諾一面電中央辭省主席，一面令王家烈代理。³⁴胡漢民在最初得到消息後，立即要求陳濟棠、白崇禧設法調停毛、王之間的衝突。胡漢民稱：「黔代表陳養初來言，毛有誤會兩粵助王家烈之說，弟已令其即去電糾正。兩兄前允以實力助毛並約束王氏，何來此謠？……毛已來歸，又素為蔣忌恨，王則不但騎牆，且為蔣所利用以劫持西南。」³⁵可見在毛王之爭之初，胡漢民是比較支持毛光翔一方，而對王家烈表示反感的。不過，當時西南兩機關剛剛成立，並無實力制止貴州內戰擴大，只能致電雙方和派出代表試圖調停，但顯然無法發揮任何效力。³⁶

隨著貴州大局底定，王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胡漢民也得到消息，了解王家烈其實並非如原先所想的那麼親蔣後，遂改變了做法，³⁷一方面安撫毛光翔，³⁸一方面開始拉攏王家烈。

早在1月17日，王家烈收到駐南京代表的電報，稱：「蔣汪合作，粵胡決聯西南各省以自固。」³⁹因此在1月20日，王家烈即派代表致函給胡漢民，稱：

³³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7冊，頁531。

³⁴ 此時期毛王鬥爭之詳情，可參閱池炫叡，〈貴州中央化（1926-1935）〉，頁51-64。

³⁵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7冊，頁455。

³⁶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7冊，頁442、497。

³⁷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7冊，頁520。

³⁸ 胡漢民於2月21日去電毛光翔，稱：「盱衡時事，覺非西南團結計劃，斷不足以挽茲危局，……先生與王司令本屬一枝，一切當易協商，現狀如何，尚盼惠示。」見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7冊，頁449。

³⁹ 「南京壽光秋畏電王家烈中央情形混亂外交財政緊要會議均停開蔣汪將合作望趁此時機毅然幹去等」（1932年1月17日），〈各方民國21年1月往來電文錄存（四）〉，《閩錫山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16-010108-0187-064。

家烈久戍湘黔邊區，愧無建樹，而於鈞座主張之抗日、剿共認為挽救黨國惟一要義，誓當奉行不懈。近以群麟（毛光翔）治黔，於黨政軍諸項黑暗腐敗，迭遭內外黔人反對，黔中將領及民眾屢電家烈，促歸主黔政，藉謀改造。家烈驚鈍，於此重責深慮不克負荷，轉失鄉人期許。鈞座吾儕導師、黨國領袖，敬懇惠予指示，俾有遵循。⁴⁰

可知王家烈在倒毛之初，就不忘拉攏兩廣。此外，當時在南京的李宗仁也致電王家烈表示支持，「尊事能力所及，當竭誠相助。黔桂唇齒相依，關係至切，況值此日寇侵凌，我儕互助團結，共赴國難，尤不容緩。既承高誼，望共努力，以期實現」。⁴¹王也致電李宗仁，稱：「貴州地處邊陲，素稱貧瘠，無論地理、歷史、經濟，均非依附兩粵不足以言生存，更非附于鈞座不足以言發展。曩曾迭電健公（白崇禧），盡情表示，茲蒙見教，亦當淬勵。倘有所命，誓效馳驅。」⁴²足見王家烈拉攏兩廣的策略初步見效，取得善意的回應。

也因為王家烈對於兩廣態度一開始即表示和善，因此雙方有了一個較好的合作基礎。在王家烈取代毛光翔之後，中央雖然給予王氏第二十五軍軍長名義，王也在3月2日正式宣誓就任，⁴³但因此時蔣中正和汪兆銘較希望貴州能實施軍民分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並未發表王家烈為省主席，而是希望由王伯群出掌貴州省主席，令王家烈感到非常焦急。⁴⁴西南政務委員會還為此去電給當時已搬遷至洛陽的國民政府，要求委任王家烈為代理省主席。⁴⁵最終在3月26日，南京行

⁴⁰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2冊，頁475-476。

⁴¹ 「李宗仁電王家烈尊事能力所及當竭誠相助黔桂唇齒相依互助團結共赴國難望共同努力」（1932年1月28日），〈各方民國21年1月往來電文錄存（三）〉，《閩錫山史料》，典藏號：116-010108-0186-113。

⁴² 「王家烈電李宗仁黔地處邊陲素稱貧瘠非依附兩粵不足以言生存更非附於鈞座不足以言發展等」（1932年2月17日），〈各方民國21年1月往來電文錄存（四）〉，《閩錫山史料》，典藏號：116-010108-0187-089。

⁴³ 〈王家烈就廿五軍軍長〉，《新聞報》，上海，1932年3月15日，版6。

⁴⁴ 池炫叡，〈貴州中央化（1926-1935）〉，頁65-66。

⁴⁵ 「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唐紹儀等電國民政府等為本會決議派王家烈暫行代理貴州省政府主席請察核任命」（1932年3月14日），〈貴州省政府官員任免（三）〉，《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32220-00195-014。

政院會議正式決議讓毛光翔辭去本兼各職，由王家烈出任貴州省主席。⁴⁶王氏最終能順利就任省主席，背後與兩廣政要的支持應該也有關聯。

此外，在西南兩機關成立之初，胡漢民即有聯合西南各省積極建設的構思，而西南各省當中則以貴州最早表態支持。⁴⁷當時一度有成立「西南交通促成會」的構想，計劃：（一）集湘、粵、桂、川、黔、滇朝野人士及專門技術人員，共謀西南交通之發展；（二）設總會於相當地點，設分會於各省市；（三）特別注重連貫數省之鐵道及其附屬事業；（四）主張在公平條件，嚴訂用途之下，吸收商股，容納外資。⁴⁸1932年9月，王家烈在呈給蔣中正的一份電報中提及：「近來倡欽渝鐵路之議，風靡西南。此從西南本身及經濟上著眼得計。」⁴⁹該計畫亦曾經見報。⁵⁰不過，由於建築鐵路需費甚鉅，且得有相當時間籌劃，⁵¹而西南各省在之後幾年間仍是戰亂不斷、財政吃緊，且同床異夢，一同構築鐵路的計畫始終沒有機會付諸實現。據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日後僅蓋成一條連接黔桂兩省的貴南馬路。⁵²

二、王家烈與兩廣關係的深化

王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後，毛氏有好幾個月一直被軟禁於貴陽城內，僅留一手槍營作為保護，⁵³因此對王憤恨異常，不斷暗中醞釀政變倒王，企圖重新取回

⁴⁶ 〈行政院第十六次會議，任王家烈黔省主席，加派胡文虎為僑委，馬文車准撤消查辦〉，《申報》，上海，1932年3月27日，版3。

⁴⁷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2冊，頁419。

⁴⁸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7冊，頁562。

⁴⁹ 「王家烈電蔣中正建築西南鐵路意見及中央處理西南局面應取途徑」（1932年9月16日），《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三）〉，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055-155。

⁵⁰ 〈西南籌築欽渝鐵路，由粵欽州經桂滇黔達重慶，全線長千八百五十五英里，分五段興工預計六年完成〉，《申報》，1932年12月19日，版7。

⁵¹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2冊，頁421。

⁵² 〈李宗仁王家烈曾在南寨會晤，對黔桂各問題接洽圓滿〉，《申報》，1934年1月17日，版3。

⁵³ 〈王家烈主黔之經過，王毛勢力互為消長〉，《申報》，1932年5月5日，版5。

貴州政權。⁵⁴ 1932年10月10日，李仲公致電蔣中正，認為當時四川爆發的二劉之戰⁵⁵可能影響整個西南局勢，毛光翔已經回到黔北去，其部隊可能有參與川戰的企圖，而一旦川戰波及貴州，王家烈勢必陷於孤立，可能會向廣西靠攏。⁵⁶一星期後，毛光翔致電蔣中正，說自己已於昨日（10月16日）回故鄉遵義掃墓，並告知貴州情形複雜，盼望蔣能領導王家烈及黔中諸將領，使各方和衷共濟；蔣則覆電稱，在此國難當頭之際，希望黔省能安定，以鞏固西南，維護大局，並盼毛光翔隨時電告貴州情形。⁵⁷當時內憂外患不斷，蔣在日記寫道：「魯事未了，川戰將起，閩、粵、桂、黔皆有醞釀內鬩，陝甘亦不能安定，如中央能專心整頓內部，確定不參加內戰政策，則對內對外皆有餘裕，不僅反動內奸，即強鄰倭俄亦無如我何也。」⁵⁸蔣似乎感受到黔戰有難以制止之勢，而其定下的方針則是不加入各省內戰，因此在爾後貴州爆發的反王家烈戰爭中，中央並無以武力介入之行動。

11月3日，軍事委員會第三廳主任朱培德電呈蔣中正，稱王家烈似乎已經派兵加入川戰的劉文輝陣營。⁵⁹而兩廣方面似亦察覺到貴州局勢之緊張，胡漢民同時致函王家烈和毛光翔，強調：「國難日深，非各方負責者精誠團結，無以求政局之更新。……弟嘗謂今日狡黠之徒，其所以分拆我西南者，在以西南制西

⁵⁴ 〈黔中醞釀政變·毛光翔反對王家烈〉，《申報》，1932年10月14日，版3。

⁵⁵ 指以四川實力派劉文輝、劉湘叔姪為核心的內戰，也是民國成立以來四川最大規模之內戰，雙方共計動員20萬以上之軍隊，彼此皆傷亡慘重。戰爭可分為1932年10至12月，及1933年7至9月兩階段，此戰以劉湘勝利告終，劉文輝失敗後被迫退往川康邊境。詳情可參閱王宏松，〈「中央化」的詮釋、實踐與挑戰：以蔣中正對四川的處置為例（1927-1949）〉，頁69-108。

⁵⁶ 「李仲公電蔣中正川戰必牽動黔王家烈孤立必乞援桂省請暗助劉湘削減其他勢力以杜西南混戰之勢」（1932年10月10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59-011。

⁵⁷ 「毛光翔電蔣中正黔中情形複雜當仰體鈞旨領導王家烈暨各將領協衷互諒納於軌物及蔣中正復電黔中各情請隨時電告」（1932年10月17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59-140。

⁵⁸ 《蔣中正日記》，1932年10月19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⁵⁹ 「朱培德電蔣中正據王家烈電稱已派兵暫往合江等地以維地方秩序」（1932年11月3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61-124。

南。我人誠能反之，彼以拆我以聯，厥謀雖狡，又何所施，然後以團結之西南，策方來之大局，國事雖糜爛，尚非不可為也。」⁶⁰可惜結果如同年初一樣，仍無法阻止貴州內戰的爆發。11月10日，毛光翔、蔣在珍等正式起兵，發動反王家烈之戰，王家烈的代表張蘊良立刻致電西南政務委員會，報告貴州情況。由於貴州緊鄰兩廣，兩廣政要擔憂一旦政局有變，中央勢力有可能趁虛而入，將影響西南甚鉅。為此，西南政務委員會立刻發出多封電報，試圖勸阻各方不讓戰事繼續擴大，電文中再次強調「外患已深，精誠團結尚恐無補危亡，倘再事糾紛，國事更復何望？黔中諸將均屬多年袍澤，即使偶有嫌怨，亦宜顧念平日恩誼，互相讓步，以謀正當解決。何可鷸蚌相持，以使漁人得利？奸人操縱，其計百出而無窮，倘陷其彀中，必至兩敗俱傷，其禍更不可收拾」。並派麥慕堯、胡畏三前往貴州調停，⁶¹王家烈也派代表王叔度、張彭年與兩廣聯繫。⁶²惟效果有限，終究難以制止戰爭擴大。

不久，王家烈後方的猶國才也跟著響應倒王行動，兩面受敵，王氏一時無法抵擋，11月24日被迫撤出貴陽，猶國才乘勝進入貴陽。⁶³29日，劉湘代表、貴州籍的鄧漢祥⁶⁴上呈一封報告，提及：

王家烈悍然不顧，擅起兵戎，業經電陳中央，請撤其本兼各職，并保猶國才繼任主席以資維繫。吾黔凋敝，可謂極矣，戰禍何堪久延。王主席以來對內則百事俱廢，對外則勾結粵桂蓉劉（劉文輝），圖謀反動。月

⁶⁰ 兩封信中，有許多地方用字遣詞完全相同，見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3冊，頁493-494。

⁶¹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7冊，頁571-572。

⁶² 〈王家烈代表抵梧州〉，《申報》，1932年11月26日，版8。

⁶³ 「毛光翔電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為我部攻下貴陽王家烈向龍里逃竄肇釁各部亦同時被師長蔣在珍完全解決」（1932年12月2日），〈貴州毛光翔王家烈二部戰爭案〉，《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2420-00006-001；嚴平，〈平剛日記選輯（續二）〉，1932年11月25日，《貴州文史叢刊》，1983年第1期（1983年9月），頁39。

⁶⁴ 鄧漢祥（1889-1979），字鳴階，貴州省盤縣人。貴州及湖北陸軍學校畢業，曾任湖北都督府參謀、貴州軍總司令高等顧問、浙江督辦公署總參議、臨時參政院參政、國務院秘書長等職。〈鄧漢祥〉，收錄於「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查詢」，<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result.php?peopleName=%E9%84%A7%E6%BC%A2%E7%A5%A5&searchType=1>（2020/2/27點閱）。

前兩粵派張蘊良運械到筑，譔又託陸壽慈〔按：應為盧壽慈，即盧燾〕回黔，表示寔力相助，其關係之切，於此可見，若中央稍予姑息，萬一奸謀得逞，粵桂與蓉劉黔王聯成一片，西南大局將不堪設想矣。望商甫公（劉湘）秘陳中央俯賜主持，准如所請，以免夜長夢多。⁶⁵

該電又稱猶國才已將王家烈擊敗，於25日進占貴陽，王氏隻身逃向龍里等。12月1日，猶國才上電何應欽，表示原奉蔣中正之命，調停王家烈和蔣在珍的戰爭，但因為王向蔣進攻，不得不採取積極行動。同日，毛光翔的代表也抵達武漢向蔣報告事變過程。⁶⁶王家烈退出貴陽後，一度行蹤不明，部隊也呈現潰散狀態。⁶⁷毛光翔因此宣稱，貴州內戰已經告一段落。⁶⁸

由於王家烈執掌黔政以來確實較親近兩廣，成了毛光翔指控他的罪名之一，⁶⁹這可能也成為中央迅速撤換王氏省主席一職之原因。12月22日，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電貴州省政府，「查該省府主席王家烈，現已離省，應以委員猶國才暫行代理主席，除先由院電飭遵照外，理合具文呈請」。⁷⁰因中央已經屬意由猶國才代理省政，猶氏遂於隔年1月1日，在毛光翔的監誓下，於省政府禮堂正式就任代省主席。⁷¹

⁶⁵ 「鄧漢祥電楊永泰等轉蔣中正據毛光翔電稱力薦猶國才繼任黔省主席以維黔局又猶部已於二十五日將王家烈部擊潰等情」（1932年11月29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十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64-045。

⁶⁶ 〈黔戰不致擴大·猶國才電告經過·毛光翔代表謁蔣〉，《新聞報》，1932年12月2日，版7。

⁶⁷ 〈王家烈行蹤不明·黔戰不日可結束·攻遵義部隊大半已潰散·何應欽電猶國才詢問近況〉，《上海商報》，上海，1932年12月2日，版2。

⁶⁸ 〈毛光翔電湘·黔事已告解決〉，《申報》，1932年12月14日，版6。

⁶⁹ 不過毛光翔自己也同兩廣有所接觸，例如在倒王前後，毛也曾派代表楊秋帆到香港會見胡漢民。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7冊，頁446。

⁷⁰ 「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呈國民政府有關貴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現已離省以委員猶國才暫行代理主席請鑒核明令發表」（1932年12月22日），〈貴州省政府官員任免（四）〉，《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32220-00196-004。

⁷¹ 「貴州省政府代理主席猶國才電國民政府等為奉命暫行兼代貴州省政府主席遵於二十二年元旦宣誓就職擬請總指揮毛光翔就近監誓請鑒察」（1933年1月4日），〈貴州省政府官員任免（四）〉，《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32220-00196-007；〈元旦猶國才就職·由毛光翔監誓〉，《社會日報》，上海，1933年1月7日，版2。

不過從貴州政局事後的走向來看，中央對於貴州局勢顯然不夠了解。表面上，王家烈這時似乎已經失敗，無力再起，但貴州情況其實仍暗潮洶湧。王氏在退出貴陽後仍在集結部隊、圖謀反攻。12月15日，王家烈手下何知重⁷²等五個師長一致通電，討伐猶國才、蔣在珍。⁷³何知重並於28日電駐南京的代表，認為反攻貴陽可在一週內完成，希望駐京代表向何應欽、何輯五等人當面傳達情況，但因為毛光翔等人表示此消息並非事實，而不被中央重視。⁷⁴到了年底，何知重已經由八寨向貴陽方向展開反攻，雙方在龍里附近再度展開激戰，猶國才的部隊傷亡甚大。⁷⁵隨後，王家烈又一次兵臨貴陽，猶國才和毛光翔撤出，王氏於1月19日重新進入貴陽。⁷⁶同日，王氏電蔣中正，以此次內鬩之故，自陳過失，蔣覆電要其「速謀安定」。⁷⁷2月4日，王家烈致電胡漢民，稱：「竊維烈與用儂（猶國才）諸人久同袍澤，情逾弟昆，復值國難期間，何忍閱牆之戰。不幸和平願望終無由達，自維涼德，深用疚心。茲者幸叨福庇，西北兩路相繼收復，全黔軍事短期可定。」⁷⁸5日，王家烈電告蔣中正，已經將毛光翔、猶國才、蔣在珍等逐出遵義，並派兵進入桐梓、松坎等處，西路也在收撫潰部，不日即可安定黔局。蔣則覆電要其先回任省主席，以免貴州省務中斷。⁷⁹因此在7日，王家烈於尚未經過國民政府正式任命下，先復職省主席，再將消息呈報國民政府。⁸⁰

王家烈之所以能反攻成功，與兩廣的支持不無關係。⁸¹據湖南省主席何鍵的

⁷² 何知重，貴州省黔北人，貴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歷任黔軍排長、連長、營長。1928年任討逆指揮部參謀長兼特務團團長，1930年任第二十五軍第一師副師長兼湘黔邊區剿匪副司令，1932年任第二十五師第一師師長兼代理湘黔邊區剿匪司令。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0冊（臺北：國史館，2008年），頁665；王俯民編著，《民國軍人志》，頁242-243。

⁷³ 〈黔五師長通電〉，《新聞報》，1932年12月19日，版6。

⁷⁴ 池炫叡，〈貴州中央化（1926-1935）〉，頁83。

⁷⁵ 〈王家烈部反攻貴陽·猶國才部傷亡不少〉，《上海商報》，1933年1月1日，版6。

⁷⁶ 〈王家烈電告入省經過·猶蔣兩部被擊潰〉，《申報》，1933年1月24日，版8。

⁷⁷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8冊（臺北：國史館，2005年），頁231-232。

⁷⁸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2冊，頁474。

⁷⁹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8冊，頁298-299。

⁸⁰ 〈黔五師長通電〉，《新聞報》，1932年12月19日，版6。

⁸¹ 池炫叡，〈貴州中央化（1926-1935）〉，頁85。

情報所言，西南政務委員會曾提供其二十萬發子彈。⁸²有報紙甚至稱，白崇禧給了三萬發子彈，機關槍二十挺，砲八門，飛機兩架。⁸³由於兩廣的協助，王家烈在重掌黔政後不久，便派出其夫人萬淑芬與甘鳳章、楊芷泉等人為代表，前往香港、廣州，深化與兩廣政要的關係。⁸⁴

此時粵桂閩三省正在組織「西南國防委員會」，打出援助熱河抗日的口號，企圖出兵北上。王家烈曾致電蔣中正詢問中央意旨，並傳達已與素來較親近中央的龍雲、劉湘正在洽談一個共同一致應付的辦法，蔣也覆電表示：「對西南國防會議，中極不贊成，龍、劉必擁護中央不與桂粵合作。以後中央對黔之方針，即以視其能否與龍、劉合作，竭誠擁護中央，不參加一切非法組織，以為斷也。」⁸⁵可見蔣希望王氏與川、滇合作，以牽制兩廣。但當時王家烈不但已經派出盧燾為代表參與會議，⁸⁶而且其本人也被推舉為該會委員之一；⁸⁷事後又稱，可派一師協助北上援熱之行動。⁸⁸另外，他還指派張蘊良組織駐粵辦事處。⁸⁹不久後，王氏又以洋煙向陳濟棠購置步槍三千把、輕重機槍二十挺、一百多萬發子彈等，⁹⁰甚至和旗下某些軍官都加入了胡漢民的「新國民黨」。⁹¹

⁸² 「何鍵電蔣中正據報西南國防會確曾接濟王家烈子彈並有代表駐黔毛光翔實力無幾勢難再起劉文輝代表謂誠意擁護中央等情」（1933年3月18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73-135；此外，在陳融給胡漢民的函電中也提到此點：「聞爵（陳濟棠）曾允甘家儀（甘鳳章）之請，助二十萬，此外更可代購。」見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1冊，頁507。

⁸³ 〈國難中之內戰·白崇禧之內戰〉，《時代日報》，上海，1933年1月25日，版1。

⁸⁴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3冊，頁520。

⁸⁵ 「蔣中正電何應欽極不贊成西南國防會議及以後中央對黔方針即以其能否與龍雲劉湘合作竭誠擁護中央不參加廣東非法為斷」（1933年2月15日），〈一般資料—手稿錄底（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412-051。

⁸⁶ 〈王家烈派盧燾入粵〉，《申報》，1933年2月11日，版9。

⁸⁷ 〈粵將領續開談話會·決定增兵入贛辦法·王家烈被推為西南國防委員〉，《申報》，1933年2月8日，版8。

⁸⁸ 〈粵桂閩決出兵援熱·編兩混成旅設一總指揮〉，《申報》，1933年3月3日，版8。

⁸⁹ 〈王家烈組駐粵辦事處〉，《申報》，1933年2月21日，版8。

⁹⁰ 「宋思一電蔣中正稱王家烈以洋煙向粵購械現已運抵黔邊」（1933年5月19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87-082。

⁹¹ 胡漢民在1932年開始組織「新國民黨」〔按：「新」字是後來的史家為了區別南京的國

從種種作為來看，王家烈在重掌黔政後，明顯更加傾向兩廣。相對地，當時貴州傳言蔣中正曾給猶國才十萬元，並密令龍雲助猶反攻王家烈，⁹²且素來較親中央的龍雲、劉湘也確實給予猶國才、蔣在珍不少援助。⁹³這些因素都加深王家烈對中央的顧忌。實際上，中央此時必須應付剿共和華北日軍的問題，對貴州局勢顯得鞭長莫及，蔣中正在日記記下：「西南之事，只可聽之一時。以力所不及，時所未到之事，雖強勉無益，而更不容其忿怒也。惟電賢初（蔡廷鍇）速回閩。黔事交托劉、龍應付也。」⁹⁴

5月份，蔣中正收到宋思一⁹⁵來電，稱王家烈向湖南何鍵購置的一架轟炸機已經運到，且王積極改善與龍雲、劉湘的關係，蔣研判王家烈近來大量購械，當有用武力徹底解決猶國才、蔣在珍等人之意。蔣擔憂一旦王家烈解決猶、蔣等部後，可能更進一步親近桂系，於是分電陳濟棠、龍雲和劉湘。蔣問陳濟棠，王家烈先前向其購買軍火之事，並要求陳將其與王家烈之關係據實以告；陳則辯解自己與王氏素不相識，賣給王氏的武器也並未如蔣所聽到的如此之多，且此舉是希望王氏穩定黔局後，可以專心剿共，裨益國家，並無其他意思。對於劉湘、龍雲，蔣告知其得到消息，王家烈向廣東新購大量武器，並經過廣西運至貴州，要

民黨，而非真的有「新」這個字〕。「新國民黨」以鄒魯為書記長，在廣州仲元學校舉辦訓練班培養人員（校長為劉廬隱）。「新國民黨」在上海和天津都設有據點，並與南京方面在海外黨務上有所競爭。有證據顯示，除了王家烈外，馮玉祥、閻錫山、方振武、孫殿英、宋哲元、佟麟閣、韓復榘、鹿鍾麟、秦德純等北方將領都曾加入過「新國民黨」。詳情見陳紅民，〈神秘的組織——“新國民黨”研究〉，收入氏著，《函電裡的人際關係與政治》，頁185-187。

⁹² 嚴平，〈平剛日記選輯（續二）〉，1933年5月10日，《貴州文史叢刊》，1983年第1期，頁41。

⁹³ 「張羣電蔣中正據劉湘電稱蔣丕緒部不日即可出動又據猶國才電告黔中局勢如中央制止無效請予劃定相當範圍並飭勿進逼」（1933年4月8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75-047。

⁹⁴ 《蔣中正日記》，1933年2月7日。

⁹⁵ 宋思一（1894-1984），貴州人。黃埔一期，曾任何應欽侍從參謀、第四師政治部主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管理處長、第十師副師長、第八十三師少將副師長、第一四〇師師長。1933年王家烈重返黔政後，宋被蔣中正派往貴州當代表，負責協調貴州與中央關係。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0冊（臺北：國史館，2005年），頁70、709。

兩人確實注意；龍雲則覆電稱：「查王紹武（王家烈）甫入貴陽，即估提特商烟土七百餘馱，星夜運桂交李宗仁之參謀長張任民，轉運至粵托陳濟棠代購軍械，所聞數目與尊電同，惟自何時起運、何時到黔則未得其詳。紹武確以兩廣為背景，而粵中文武又頗有以西南盟主自居，以執行部名義號召西南，以為反抗中央之工具。」⁹⁶而前往貴州調停的麥慕堯、胡畏三也向胡漢民表示：「滇龍在紹（王家烈）未反攻前，曾致紹口口，左袒毛、猶，後劉（湘）亦於事變前接濟毛、猶械彈。毛、猶出走後，必乞援龍、劉。劉素以川、滇首領自居，聯龍以助毛、猶，黔局立生重大變化。請我方電滇龍，勸其嚴守中立，並接濟子彈，以便防禦。」⁹⁷可見貴州局勢複雜，內戰各派與中央及周圍各省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此刻中央雖無力介入，但依靠較親中央的龍雲、劉湘來支持毛光翔、猶國才，仍可相當程度牽制支持王家烈背後的兩廣。

三、貴州內戰與兩廣調停

王家烈雖然得到兩廣幫助重掌黔政，卻一直無法順利解決退入川黔、川滇邊境的蔣在珍、猶國才部，雙方仍時有戰事。猶國才部在退入雲南後，王家烈曾派代表盧燾與猶談善後問題。猶氏要求王提供盤江數縣讓其殘部暫駐，但王只肯讓出興義一縣，這讓猶及其所部皆感到王缺乏誠意，遂重新向貴陽方向發兵，並聯絡黔北的毛光翔、蔣在珍、車鳴翼等部響應。⁹⁸王家烈雖然在稍後同意讓出盤江

⁹⁶ 「宋思一電蔣中正稱何鍵贈王家烈轟炸機一架已抵貴陽及此間與龍雲情感漸趨濃厚等」（1933年5月14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87-077；「陳濟棠電蔣中正稱其與王家烈素不相識此次代購步槍事原期早定黔局俾可移師剿共並無他意」（1933年5月22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十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89-022；「龍雲電蔣中正稱王家烈甫入貴陽即提煙土轉運至粵託陳濟棠代購軍械及粵方對中央毫無誠意對黔王則極力扶持究應如何應付黔事盼明示」（1933年5月22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十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89-094。

⁹⁷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1冊，頁507。

⁹⁸ 「龍雲電蔣中正貴州省現況聞猶國才部有自行入黔模樣及如王家烈能將盤江劃出與猶軍事或不致擴大」（1933年4月3日），〈積極治邊（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2-00013-281；〈黔局復趨嚴重·王家烈部三面受敵〉，《申報》，1933年

八縣，才暫時停止了與猶國才部的戰事，⁹⁹但蔣在珍仍不肯就範，王蔣戰爭仍繼續進行，¹⁰⁰一直到5月下旬，王部師長侯之擔將蔣擊敗，逐出松坎、遵義，迫使其退入川境後才告一段落。¹⁰¹

為達成「以西南結西南」的理想，兩廣也介入貴州內部爭端中。西南政務委員會除了先前已經派出麥慕堯、胡畏三從事調停外，還打算再派但懋辛¹⁰²到貴州去協助，¹⁰³還有提出讓猶國才率所部到北方援助熱河戰事，又或者讓猶出洋，所部由王家烈改編等建議。¹⁰⁴但上述提及，王猶最初在談判時，猶部尚有五千人左右散落在滇黔邊境上，嚴重缺乏輜重，官兵饑渴不堪，因此要求王家烈讓出盤江供部隊駐防，但王只同意讓出興義一縣，這使得資源匱乏、饑饉已久的

5月3日，版3。

⁹⁹ 「王家烈電蔣中正為安定貴州局勢請准劃撥盤江八縣給養猶國才部」（1933年4月10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75-087。

¹⁰⁰ 「王家烈電蔣中正遵即指定駐地安置猶國才蔣在珍兩部力弭內爭」（1933年5月2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83-004；「宋思一電蔣中正稱蔣在珍部刻在遵桐一帶與王家烈混戰侯之擔部已占松坎猶國才仍未動」（1933年5月3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83-118。

¹⁰¹ 「宋思一電蔣中正聞蔣在珍率部向遵義東北退走王家烈侯之擔均派隊跟追」（1933年5月8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85-001；「宋思一電蔣中正近日蔣在珍楊森部均被王家烈侯之擔擊潰蔣之大部退至鳳泉餘隨楊森退至正安及劉湘王家烈約同解決楊部等」（1933年5月27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二十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92-002。

¹⁰² 但懋辛（1886- 1965），字怒剛，四川省榮縣人。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曾任川熊克武部第一師師長、第一軍軍長。1924年因楊森受到吳佩孚資助，擊敗熊克武、劉湘，熊、但退往貴州遵義，1925年入粵。旋因熊氏被懷疑有私通陳炯明之嫌，遭到蔣中正扣押，但氏的第一軍殘部也被李宗仁桂軍和譚延闓湘軍繳械，從此遠離軍界。王俯民編著，《民國軍人志》，頁226。

¹⁰³ 〈西南領袖調解黔事辦法·擬派但懋辛赴黔斡旋·毛王均有接受調停意〉，《申報》，1933年2月9日，版12；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1冊，頁506-507。

¹⁰⁴ 〈各方代表聯翩蒞粵·互商應付時局問題〉，《申報》，1933年6月10日，版10；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3冊，頁549。

猶部認為王毫無誠信，更加深了猶國才對王的不滿與不信任感。¹⁰⁵ 猶國才向胡漢民稱：「紹武頭腦粗疏，不諳政治，主黔經年徒使民生凋敝，兵燹頻仍。……黔局和平，曩經鄰省迭次主張，並派員敦進，其歷久無成者，一由於紹武屢次爽約，一由於黔東北各部要求軍民分治，處置持平之要點，未獲實現。」¹⁰⁶ 顯見王猶間心結之深，也註定該次調停難有結果。

到了1933年9月，王猶之間又爆發大規模戰事，¹⁰⁷ 王家烈再度向陳濟棠購置大量軍火。¹⁰⁸ 大約同時，王家烈也同兩廣簽訂「三省互助協定」，約定三省中若任何一省被攻擊，另外兩省需出兵協助，彼此合作更為密切。¹⁰⁹ 由於受到兩廣的大量援助，這回王家烈的反攻頗為順利，年底陸續收復黔東各縣，¹¹⁰ 且擊敗由湖南進攻黔東的車鳴翼、蔣在珍部，迫使其退回湘川黔邊境。猶國才至此才有與王和解的表示。¹¹¹

雖然王家烈再次取得勝利，但許多人皆認為「王於軍事上固占有優勝，惟政治則糟甚」。¹¹² 因為自從王家烈上台後，其夫人萬淑芬喜愛干預政治，常奔波在京滬和廣州之間，為王打好對外關係，且萬之兄弟子侄多人均被委以重任，如萬稚新為省府秘書長、萬載之為軍部經理處長、萬式俊為縣長、萬式炯為團長、萬式楷為營長，把持了省政，而有「王綱墜地，萬惡滔天」的說法；由於萬家出自銅仁，政壇上遂又產生一個以萬淑芬為中心的銅仁派，紛紛出占要津，讓許多

¹⁰⁵ 「龍雲電蔣中正貴州省現況聞猶國才部有自行入黔模樣及如王家烈能將盤江劃出與猶軍事或不致擴大」（1933年4月3日），〈積極治邊（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2-00013-281。

¹⁰⁶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3冊，頁528。

¹⁰⁷ 〈黔省內戰又起·猶國才與王家烈部激戰〉，《申報》，1933年9月30日，版9。

¹⁰⁸ 〈粵黔互助擴充實力·王家烈向粵購械·陳濟棠向黔募兵·黔戰將一觸即發〉，《申報》，1933年10月16日，版8。

¹⁰⁹ 王家烈，〈貴州桐梓系軍閥與新桂系軍閥的關係〉，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西文史資料》，第九輯，頁100-101。

¹¹⁰ 〈王家烈部收復黔東各縣〉，《申報》，1933年12月17日，版6。

¹¹¹ 胡漢民在1933年12月30日分別有函給王家烈、毛光翔、猶國才，勸各方停止數年內戰，以減輕黔民痛苦。見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4冊，頁381-382；〈黔內戰結果·王家烈猶國才攜手〉，《新聞報》，1934年1月9日，版9。

¹¹²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5冊，頁473。

桐梓系發出「金克木」的感嘆。另外，王所委任的財政廳長鄭先辛、建設廳長劉民傑、考核主任蔣寶丞、貴州銀行行長李錫祺、電政局長劉迪臣等，也皆為其親信，許多桐梓系元老或者助王取得政權的有功之人，皆不獲重用，因此內部怨懟不斷，這是王家烈上任後，內戰不斷的重要原因。¹¹³

王家烈本人也意識到，只憑藉武力難以徹底解決貴州內部的問題，遂告知胡漢民，決定「現擬兼施恩惠，冀其稍知悔悟，使軍事早獲結束，努力整理政治」。¹¹⁴而西南政務委員會也指派廖若虛、吳厚安、劉少南、謝汝霖等到貴州見毛光翔、猶國才，以推動貴州黨務，團結西南各省。¹¹⁵1934年1月10日，慶賀貴南馬路通車典禮，王與李宗仁在黔桂邊境的南寨會晤，商談兩省進一步合作事宜。¹¹⁶會談中，王向李透露對龍雲可能幫助猶國才再次來攻的擔憂，李則認為龍雲不至於真的對貴州動武，否則兩廣一定有所行動助黔，並跟王保證以後會繼續替他跟廣東方面磋商，以利軍械取得；同時，李也建議王應趁軍事告一段落時，加緊整頓內政。¹¹⁷當時就有消息傳出，由於李宗仁積極調和貴州各派紛爭，因此王家烈願意交出政權，擁毛光翔重新出任省主席，並任命盧燾等人出任省委，自己專心軍政；¹¹⁸或者亦有消息指出，王家烈願意擁護盧燾出任省主席，毛光翔允

¹¹³ 王家烈，〈桐梓系統治貴州的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頁28；吳道安，〈解放前貴州政局演變概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93-94；〈黔變顛末·由毛王之爭說到周西成·王家烈政策宣告失敗〉，《夜報》，上海，1933年1月8日，版2。

¹¹⁴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2冊，頁483。

¹¹⁵ 時恰逢閩變爆發，貴州黨部有函電給胡漢民，勸其到南京共赴國難，可見貴州省黨部與西南執行部立場相差甚遠，這次派員入黔圖謀整理貴州省黨務，與此應有關係。見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8冊，頁501-502；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9冊，頁496；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1冊，頁488。

¹¹⁶ 〈李宗仁王家烈曾在南寨會晤·對黔桂各問題接洽圓滿〉，《申報》，1934年1月17日，版3。

¹¹⁷ 王家烈，〈貴州桐梓系軍閥與新桂系軍閥的關係〉，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西文史資料》，第九輯，頁100。

¹¹⁸ 〈黔局李宗仁斡旋·毛主政·王主軍〉，《大公報》，1934年1月12日，版1。

諾擔任西南政務委員會政務委員，準備離黔到粵就職。¹¹⁹當時，西南政務委員會還派出廖若虛等到貴州遞送委任狀，準備迎毛來粵。不過，毛最終以母親生病為由婉拒赴粵。¹²⁰而李宗仁在3月27日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僅說與王家烈的會晤只談及黔桂兩省交通問題，並未涉及軍事、貴州省政等其他方面。¹²¹

肆、剿共問題與中央和兩廣在黔省的角力

一、紅軍進入貴州與貴州局勢演變

1934年初，雖然王猶之間仍是明爭暗鬥，但至少雙方暫時沒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經過調停後，猶國才同意就任全省剿匪總指揮一職，所部每月獲得二萬五千元補助。¹²²胡漢民在給貴州財政廳長鄭先辛的電報中提及：「支電奉悉。黔局日趨和平，甚慰。所示內政建設方針，均極切要，尚盼勉力進行，為民造福。」¹²³

可惜平靜不了多久，5月以後，大批紅軍開始竄入貴州東部，賀龍的紅三軍與蕭克的紅六軍分別從四川、湖南進入，使貴州面臨空前的威脅。¹²⁴此時王猶之間矛盾再現，西南政務委員會雖電雙方各派代表來廣州商量具體辦法，但經過一年以上的調解經驗後，眾人多已不抱太大期望。胡漢民認為「黔省不少人才，而最不一致，派別之分較他省為多」。¹²⁵李宗仁也認為「蔣氏圖湘、黔甚急，

¹¹⁹ 〈王家烈毛光翔抵邕·王允放棄政權擁盧燾〉，《民報》，上海，1934年1月18日，版2。

¹²⁰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4冊，頁381-382；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1冊，頁488-489；〈毛光翔不赴粵〉，《大公報》，1934年1月16日，版4；〈毛光翔任西南政委〉，《新聞報》，1934年1月26日，版7。

¹²¹ 〈李陳晤商時局〉，《新聞報》，1934年3月28日，版6。

¹²² 〈黔西糾紛解決〉，《新聞報》，1934年3月28日，版6。

¹²³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8冊，頁511。

¹²⁴ 周春元、何長鳳、張祥光主編，《貴州近代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27-232、234-236。

¹²⁵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6冊，頁376。

影響兩粵前途極鉅」；但又表示「對黔經電紹武、用儂派代表來協商和解，但此皆非根本要圖，聊以盡人事已耳」。¹²⁶

7月25日，在貴州情勢險峻及各方呼籲下，王、猶在關嶺舉行會議，氣氛尚稱融洽，雙方談及貴州的人事安排、剿共、政治、軍隊等問題。王家烈在會上允諾讓猶國才出任省主席，負責省內民政，而自己負責軍政，27日，猶國才也親自到貴陽與王家烈商談進一步合作事宜；¹²⁷但因部屬抗議，王旋即反悔，最終只讓出自己兼任的民政廳長給猶國才，且未經猶的同意就逕自對外發表，令猶大感不滿。¹²⁸西南政務委員會再度派出麥朝樞、王若周到貴州調停。此外，龍雲也加入貴州的調停事務。龍雲在給胡漢民的一封函電中提及調停黔事之原因與經過，云：「黔事自起內爭，曩已迭經調解，陽雖表示和平，而陰實各懷猜忌，故無甚效果。近則賀匪坐大、蕭匪深入，此間以接壤關係，不憚繁瑣，一再電勸紹武、用儂務必開誠合作，一致討匪，以顧大局而抒黔禍。雙方雖已接受此意，然紹武防猶之心仍未解，茲用儂表示態度計，已允日內即隻身到貴陽與王面商一切。如此，則王猶合作當可實現矣。」¹²⁹但王仍暗令手下師長何知重提防猶部。¹³⁰在大敵當前下，王猶二人依舊明爭暗鬥、相互提防，但為了剿共大局考量，各方皆勸導王、猶能切實合作。

經各方長時間呼籲後，到了10月12日，猶國才終於再度隻身進入貴陽，表示當團結各方、努力剿匪。¹³¹胡漢民知道消息後，致電猶國才：「知決定與紹

¹²⁶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8冊，頁528。

¹²⁷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9冊，頁502；〈王家烈猶國才修好〉，《中央時事週報》，第3卷第33期（1934年8月），頁35；「王家烈猶國才關嶺會晤」（1934年7月27日），〈王猶之戰檔案史料一組〉，《貴州檔案史料》，1987年第1期（1987年〔月份不明〕），頁66-67。

¹²⁸ 猶國才對朱紹良稱，其與王家烈在關嶺會面，原期能實行分治辦法，但因王家烈食言，還欺瞞中央，遂逕自發表其為民政廳長的命令。〈猶國才復朱紹良電·黔事尚有問題〉，《新聞報》，1934年8月30日，版8。

¹²⁹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3冊，頁527。

¹³⁰ 「戴笠電蔣中正據裴存藩電稱兩廣迭電龍雲以防共為名行攻守同盟反對中央及王家烈主力何知重部仍於安順防守猶國才部」（1934年10月2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三年（四十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184-072。

¹³¹ 〈猶國才抵貴陽〉，《新聞報》，1934年10月14日，版9。

武主席面商剿共大計，並擬將所部開赴黔東，共同工作，維護大局，且繳〔？〕偉識。共匪之患甚深且切，弟前者奉書經即詳述，誠能相共防剿，豈僅黔民之幸。」¹³²幾天後，貴州代表來港，與胡漢民談黔事，提出許多改善貴州現況的辦法，胡立刻函電陳濟棠、李宗仁：「黔事關係重大，於剿共時期尤須有切中肯綮之辦法」，希望陳、李與貴州代表切實協商共同對策。¹³³23日，王家烈還親自到石阡與桂系將領廖磊及湘系將領李覺商量剿共事宜。¹³⁴

二、中央軍入黔與兩廣態度

1934年8月16日下午四點，針對蔣中正圖謀進軍川、黔的消息，陳濟棠召開西南執行部常務會議，討論應付時局方針。會中陳濟棠認為，此時應聯繫川滇黔各省以共同抵抗蔣，萬萬不可錯過時機，只要三省願意聽從西南〔按：在此指以「西南兩機關」為架構的兩廣當局〕領導，整個大西南局面當大有可為，但必須要快速且秘密行動。蕭佛成則提出疑問，倘若胡宗南、楊虎城進入四川，劉湘恐無能力抵抗，西南當局可有實力助劉湘？鄒魯則指出，貴州王、猶兩人依舊面合心不合；而目前的策動工作應以拉攏陝西、四川、貴州三省為主，如果三省能與西南配合，山西閻錫山應該也能與西南合作，到時形勢將大有可為；但當前的重點在龍雲能否與西南合作，即使不能與西南合作，只要其能嚴守中立，則西南當局亦有機會打開局面；至於楊虎城，他與之常有代表往來，有信心處理與楊的聯繫問題。陳濟棠接著又言：「若必要時，則兵亦要用到了，但我意欲不求甚遠，只要固我西南基礎。」陳又提到：「王氏送來電報，似甚負氣，猶氏則我們兩人（陳濟棠、李宗仁）可作其擔保，使其安心入去，但不宜偏持，如果舉王氏之人一概掃清，則亦不合，必使王氏有達其意見之餘地，此我兩人又應從中調停者。總之，黔事要使其聽我兩人說話，勸王故在讓猶，同時亦使猶不可迫王過甚，而我人立言則以竭力幫助，使之達到軍民分治而止。」¹³⁵由此看出，西南政要欲

¹³²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5冊，頁395-396。

¹³³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5冊，頁396-397。

¹³⁴ 〈王家烈赴石阡，與廖磊李覺會商剿匪〉，《新聞報》，1934年10月23日，版6。

¹³⁵ 「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16日），收入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0冊，頁466-467。此件時間只署名16日晚，據王宏松研究，時間當為1934年

藉此機會聯絡各省，打開新的局面；但是陳濟棠又不忘強調，雖然必要時可以出兵，但他的意圖只求鞏固現有西南局面，可見其野心不大。另外，從陳濟棠、鄒魯等人的談話顯示，兩廣政要皆認為王家烈、猶國才二人仍有一定的心結存在，必須要再設法調和。

10月，由於國軍第五次圍剿奏效，紅軍開始由江西向西南各省方向突圍，愈來愈多紅軍進入湖南、貴州。紅軍西竄，給予蔣中正統一西南各省之機。據時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的晏道剛回憶，蔣曾對陳布雷言：「川、黔、滇三省各自為政，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而用兵還好，川、滇為自救也不能不歡迎我們去，更無從藉口阻止我們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機會。今後只要我們軍事、政治、人事、經濟調配適宜，必可造成統一局面。」¹³⁶ 又，據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何其鞏於11月呈給蔣的一份建議，提出三大國防計畫：一、安定北方；二、鞏固中部；三、經營西南。其中第三點提及：

川滇黔三省，擁有七千萬以上之人口，形險而地腴，煤鹽油礦以及各種金屬皆不缺乏，足為國防最後支撐點，宜乘徐匪（徐向前）猖獗之時，或在贛匪西竄之時，力加經營。即鈞座不能親往，亦宜派忠義大員統帥重兵入川，第一步清剿共匪，第二步整理三省軍政，第三步發展交通及一切產業，在彼建立國防重工業之主要部門，一旦國際大戰發生乃能處於可戰可守可進可退之地，爭取最後之勝利，達到復興民族之目的，如土耳其之都安哥拉，足資借鑑。¹³⁷

蔣看完後回覆何氏：「所見各點卓見甚是，當存備參考。」¹³⁸ 可見中央軍進

8月16日。見王宏松，〈「中央化」的詮釋、實踐與挑戰：以蔣中正對四川的處置為例（1927-1949）〉，頁122。

¹³⁶ 晏道剛，〈追堵紅軍的部署及其失敗〉，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冊（北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0年），頁11。

¹³⁷ 「何其鞏呈蔣中正抗日救國根本大計在於安定北方鞏固中部經營西南之意見及蔣中正復電所陳各點卓見甚是當存備參考」（1934年11月25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三年（五十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194-043。

¹³⁸ 「何其鞏呈蔣中正抗日救國根本大計在於安定北方鞏固中部經營西南之意見及蔣中正復電所陳各點卓見甚是當存備參考」（1934年11月25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三年

入貴州等西南地區，亦有統一西南以為將來抗戰做準備之企圖。

面對局勢變化，11月初，王家烈在馬場坪與猶國才、蔣在珍、侯之擔等人開會。眾人決定盡釋前嫌，以保存黔省地盤與軍政大權為最高考量，對共軍則採取防而不打、堵而不追的策略，盡量避免衝突，對鄰省則表示親善。¹³⁹ 儘管貴州內部各派已經決定暫時合作，但王家烈一方面要防堵紅軍，另一方面還要擔憂中央軍的到來將影響自己的獨立性，遂只能更加強同兩廣的合作。蔣中正也準備利用這個機會，將中央勢力擴展至西南各省，貴州遂成為兩廣與中央攻防的另一個戰場。

12月2日，蔣在日記中寫道：「桂事先從黔湘入手，先入黔後定湘，而後收桂，則得因利乘便之道。」¹⁴⁰ 可見蔣對於如何因應西南各省局勢已有定見，計劃先收取貴州、湖南，下一步圖謀廣西。相反地，胡漢民則顧慮道：「共西竄，蔣借剿共壓迫，形勢頗惡，兩廣大計未定。」¹⁴¹ 此時，因閩變失敗而遠在美國的蔡廷鍇也接到國內「赤匪大部西竄，有占川貴之勢，伯南（陳濟棠）祇保守，桂方力量單薄，現均不能打開局面，但蔣圖南甚急」消息，認為「如果粵桂軍事仍不開誠合作，黨國前途悲觀萬分也」。¹⁴² 10月30日，蕭佛成給胡漢民的信中亦云：「蔣氏集重兵於南方，又復故縱赤軍，使其突圍西竄以犯黔，其計甚狡。……假如共軍決心放棄贛南及閩西以圖川黔，則蔣必藉口統一贛省而奪取我已得戰地，而駐閩西之蔣軍則因共軍已放棄長汀而無後顧之憂，可以用全力壓迫我東區。」對西南政局的前途也甚表擔憂。¹⁴³

紅軍進入貴州後，在短時間內席捲許多地區，12月14日攻陷黎平、22日陷台拱、25日陷鎮遠、28日陷餘慶和甕安、30日抵達烏江南岸、1935年1月4日陷湄

（五十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194-043。

¹³⁹ 楊維真，〈剿共與統一——論1935年中央改組貴州省政府事件〉，「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1年10月6-9日，頁11。

¹⁴⁰ 《蔣中正日記》，1934年12月2日。

¹⁴¹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9冊，頁505。

¹⁴²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9冊，頁494。

¹⁴³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0冊，頁480。

潭、7日陷遵義、10日陷桐梓，一共擊潰黔軍十多個團，而薛岳率領的大批中央軍也於1934年12月18日後陸續進入貴州境內。¹⁴⁴ 晏道剛的報告稱：「黔軍見匪即退，似應速派大員統一指揮。」又稱：「王家烈、猶國才敬午電，以黔省財政枯竭，懇撥月資廿萬等語，似應給予補助。」¹⁴⁵ 王家烈也向中央稱：「職以黔省兵力單薄，已遵鈞令派兵十二團，經綸寨、都勻推進。惟經費素難，今出省剿匪，經囑各費，不敷約五十餘（萬）元。中央財政支絀，職亦深知，擬請仍補助廿萬元，以利戎械。」¹⁴⁶ 幾乎同時，蔣中正又收到消息，獲知王家烈已經向陳濟棠、李宗仁和胡漢民請求粵桂兩省派兵入黔協剿。¹⁴⁷ 不過，由於中央軍已經先入黔，所以蔣樂觀地認為：「我軍既入黔，不患不能制桂，故可緩圖之。且應利用湘何（何鍵）攻桂，是亦一策也。」¹⁴⁸

1935年1月2日，紅軍強渡烏江，與黔軍侯之擔部爆發激戰，經三度強攻，黔軍防線崩潰，局勢吃緊。¹⁴⁹ 王家烈在這一天內連續兩電胡漢民，告知：「現在匪勢披猖，渡江北竄，遵、桐諸邑危殆萬分，敝軍各部現正跟蹤追剿，惟匪眾我寡，勝算難操，幸荷粵、桂友軍入黔協剿，當不難短期蕩平。烈與黔民同深感謝。」「自剿匪軍事發生，餉援斷絕，羅掘俱窮。近月以來，尤感拮据，尚懇先生加惠黔人，特予維護，俾經濟上荷蒙之援助，烈等得以專力從事剿匪工作，克竟全功，尤為感禱之至。」¹⁵⁰ 並向陳濟棠、白崇禧去電求援，希望兩廣部隊迅

¹⁴⁴ 薛岳，〈黔滇川追剿〉，收入氏著，《剿匪紀實》（臺北：文星書店，1972年），頁7；周春元、何長鳳、張祥光主編，《貴州近代史》，頁242。

¹⁴⁵ 「蔣中正電晏道剛已悉黔軍應派大員統一指揮及黔省財政枯竭等情」（1934年12月30日），〈親批文件—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至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70100-00038-036。

¹⁴⁶ 「蔣中正電熊式輝晏勛甫已悉派十二團往黔省及補助剿匪經費二十萬元」（1935年1月2日），〈親批文件—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至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70100-00038-077。

¹⁴⁷ 「王家烈電陳濟棠白崇禧等中央現派上官雲相率三師一旅入川剿匪」（1935年1月2日），〈各方民國24年1月往來電文錄存（一）〉，《閩錫山史料》，典藏號：116-010108-0295-008。

¹⁴⁸ 《蔣中正日記》，1934年12月29日。

¹⁴⁹ 楊維真，〈剿共與統一——論1935年中央改組貴州省政府事件〉，「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頁12。

¹⁵⁰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3冊，頁529-530。

速入黔幫忙圍堵紅軍。¹⁵¹可見貴州無力單獨應付紅軍西竄問題，且財政困難、兵力不足，中央軍又大批開進貴州，不得不向兩廣請求財政、軍事援助，但粵桂部隊前進速度緩慢，為時已晚。¹⁵²

1月4日，王家烈、猶國才、何知重三人前往馬場坪與薛岳會面，會商軍事部署，薛岳表示，中央軍此來專為剿共，且「並指天日，除進剿外，絕不過問他事」。但王家烈顯然對薛岳不敢放心，隔天再度致電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桂軍盡快趕赴貴陽，協助剿共，可是就在這天，薛岳的先頭部隊搶得先機，成功進入貴陽城內，隨後幾天大批中央軍陸續進城。¹⁵³不久後，薛岳在貴陽城內張貼告示，招募貴州兵勇，月薪多者15元、少者8元，甚至凡入營者即先給5元安家費，此舉被認為是「軟撤二十五軍之法也」、「已可使紹武部下解體矣！」¹⁵⁴

在中央軍占領貴陽，接管城防之後，連王家烈本人出入城門都受到盤查，處境難堪。面對中央軍反客為主的情況，他深感在貴陽已無發展餘地，遂決心率領部隊前往黔北故鄉圖謀發展。¹⁵⁵而兩廣方面也有人悲觀表示：「西南對於黔省，已無經濟之接濟，而追剿部隊又復遲遲其行，將來鬼方古國，不知將如何變化。惟不孤〔按：李宗仁〕則極抱樂觀，其實吾人所抱無窮之希望，亦在不孤之一行焉爾。」¹⁵⁶

儘管如此，仍有不少兩廣政要持出兵貴州之意見，其中廣西因財政稅收近半仰賴貴州的鴉片煙款，在中央軍控制貴陽後，適足以致廣西財政於死地，¹⁵⁷因

¹⁵¹ 「王家烈電陳濟棠白崇禧等中央現派上官雲相率三師一旅入川剿匪」（1935年1月2日），〈各方民國24年1月往來電文錄存（一）〉，《閩錫山史料》，典藏號：116-010108-0295-008。

¹⁵² 桂軍廖磊部至1月13日方抵達都勻。薛岳，〈黔滇川追剿〉，收入氏著，《剿匪紀實》，頁11。

¹⁵³ 池炫歡，〈貴州中央化（1926-1935）〉，頁104-106

¹⁵⁴ 嚴平，〈平剛日記選輯（續二）〉，1935年1月17日，《貴州文史叢刊》，1983年第1期，頁45；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1冊，頁449。

¹⁵⁵ 王家烈，〈黔軍阻擊中央紅軍經過〉，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冊，頁189。

¹⁵⁶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1冊，頁450。

¹⁵⁷ 楊維真，〈剿共與統一——論1935年中央改組貴州省政府事件〉，「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

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尤其希望出兵。1月25日，薛岳給蔣中正的電報中提及，李、白希望粵桂軍能與中央軍會師貴陽，共同擔負剿共任務；蔣批覆薛岳，與李、白切實研討，促其實現，但又有「惟粵桂軍均遲遲不進，此次出兵似純為保護其烟土運送，毫無協剿之決心」等語。¹⁵⁸而從龍雲上呈的一份報告來看，王家烈雖率兵前往黔北，但與兩廣仍時有聯絡，不斷要求粵桂軍隊入黔；廣西甚至派出葉琪、劉震寰到雲南，鼓動龍雲一起出兵貴州，且認為在外交艱難的情況下，中央不會真的對各省用兵。¹⁵⁹此外，散在湘黔邊界的原劉震寰舊部黎鼎鑒的部隊約有三千多人，聞兩廣有派兵入黔之計畫，主動表示願意依附兩廣當局。¹⁶⁰種種跡象均顯示，從中央軍進入貴州到占領貴陽期間，王家烈、兩廣及各方勢力一直蠢蠢欲動。蔣中正亦相當關注兩廣的動向。1月底，在本月反省錄寫道：「十五、粵方態度較前改善，而桂胡頑梗如前，對桂只有待機、對胡慰藉、對粵懷柔，而對汪慰藉之。……十七、黔王仍須保留其名義，再試之。」¹⁶¹可見至1月底時蔣仍沒有撤換王家烈的意圖，且因廣東實力派陳濟棠對中央態度稍有改善，雖然桂系和胡漢民態度依然強硬，但蔣仍希望能盡可能與之保持親善。

而兩廣方面對蔣仍相當疑慮，1月26日，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等收到國民政府委員柏文蔚的密報：「寧積極備戰，刻正籌設兵站，戰期恐不出三個月外。寧方策略，先桂後粵，冀粵視望，收各個擊破之效。」¹⁶²這使得兩廣仍未徹底放棄出兵之計畫，不過最大的問題仍在於陳濟棠的猶豫不決。蕭佛成給胡漢民函提及：「以現在局勢觀之，在此三數月之內，蔣決不敢加兵於兩廣，申〔按：陳濟棠〕亦深知此義，故毅然有出兵追剿之快舉。及至近日，微聞門

際學術討論會」，頁25。

¹⁵⁸ 「薛岳電蔣中正據派赴南寧連絡團長蕭文電稱粵桂軍願與中央部隊一致推進剿匪共同奠定川局及李宗仁擬俟部隊集中即赴前方負責等情」（1935年1月25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202-100。

¹⁵⁹ 「中央剿辦贛閩共匪粵桂兩軍觀望致共匪西竄」（1935年2月23日），〈粵桂政變情報（一）〉，《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3-001。

¹⁶⁰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9冊，頁499。

¹⁶¹ 《蔣中正日記》，1935年1月31日「本月反省錄」。

¹⁶²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4冊，頁124。

〔按：蔣中正〕有聯展〔按：日本〕意，遂更變進取之計劃為退守，今追剿之軍僅至柳州為止。其意為一則不欲公然違抗門意，二則恐門如果加兵於廣東，則駐柳州之軍隊緩急。於是遂成一極矛盾之僵局，未知將如何結局也。昨日不〔按：李宗仁〕來，言申怪不出兵遲緩，致使對方捷足先制。不應之曰，我已出兵而爾尚無動員之準備，何以反怪我。各一笑之而罷云云。（以弟默計，此必由申已願放棄鬼方。又不敢露骨反門，故使不方先入黔做歹人，而渠得做旁人，留後來多少地步。在不方以申尚未派兵繼進，渠亦不敢孤軍深入，至弄成今日之僵局耳。）¹⁶³可見兩廣內部最大問題出在陳濟棠瞻前顧後、患得患失，此點亦為蔣所深知。1月底，蔣給薛岳的電報中已經提及：「黔北之匪不日即可肅清，粵桂軍不必入黔，中已轉商伯南，而兄亦可向桂婉勸，其在都勻等部不必再行北進，何如？」¹⁶⁴2月6日，又有電指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時任蔣駐香港之代表蔣伯誠：「聞桂軍恐中央乘機襲桂，頗有戒備，可否請伯南兄從中調處，或委德鄰（李宗仁）以桂黔邊區相當名義以慰之。何如？請與伯南兄商之。」¹⁶⁵陳濟棠的立場徘徊在桂系、元老派與中央之間，使兩廣出兵計畫難以實現，也使中央有餘力在貴州站穩腳跟。

蔣在這段時間甚為關注粵桂情況。如2月2日，在上星期反省錄寫道：「二、對桂仇怨未消，如何使其畏威懷德，當慎思之。三、對胡應慰藉之，使其改正歸好也。」3日：「白逆赴粵，其必為粵不願之共同入黔之故。」5日：「桂粵逆謀未息，宜使了解。」7日：「粵桂異圖已見，如何使其安心，豈非討伐不可乎，應積極偵查。」9日：「三、桂逆謀漸急，應制防之，如何使安定其心。四、胡漢民陰謀不已，如何使其安分。」16日：「粵桂逆謀未殺，可慮也。」¹⁶⁶以上略舉《蔣中正日記》為例，說明中央軍進入川、黔之後，蔣時時關注且思索如何處置兩廣中的元老派、粵系、桂系問題，為此煞費苦心。

¹⁶³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1冊，頁456。

¹⁶⁴ 「蔣中正電薛岳黔北共軍不日既可肅清粵桂軍不必入黔」（1935年1月31日），〈革命文獻—剿共（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200-00029-031。

¹⁶⁵ 「蔣中正電蔣伯誠黔省已無赤匪桂粵軍無須入黔可否請陳濟棠商議調處中央與粵桂軍戒備事或委李宗仁以桂黔邊區相當名義」（1935年2月6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205-091。

¹⁶⁶ 《蔣中正日記》，1935年2月2、3、5、7、9、16日。

「以西南結西南」的嘗試與失敗：以貴州政局變化為核心的考察（1932-1935）



圖1、粵師援黔剿共

資料來源：〈粵師援黔剿共〉，《申報月刊》，第4卷第2期（1935年2月），無頁碼。

2月6日，蔣中正收到蔣伯誠來電，稱桂系不滿中央將王家烈調往黔北，阻斷黔桂軍隊聯繫，又不給桂軍剿匪名義，且不發給粵軍飛機護照，認定蔣有意解決王家烈，再壓迫兩廣，因此胡漢民倡導粵桂合作，還企圖拉攏龍雲加入兩廣陣營，並計劃由粵軍入桂、桂軍入滇黔邊境，以抵禦中央軍；對此，蔣伯誠建議：「應調王家烈離黔入川，並派黔綏靖主任，封鎖烟土入桂。」蔣批示：「蔣伯誠觀察極清，所陳黔事，亦極有見地。」隔天蔣給薛岳的兩封電報就提及：「我駐貴陽、貴定各部隊，應秘密布置防範，以防萬一，桂態殊難測也。王家烈部主力

最好令其與中央部隊一路前進，使其離黔追剿，與其任務，暫不返黔，但不可稍露形跡，免其畏懼。」「最近西南情形，軍人毫無覺悟，政客盡情挑撥，依然故態，絕未改善。」並把蔣伯誠前一日上呈的情報告知薛岳，要其防備兩廣方面的行動。¹⁶⁷對此，王家烈似乎很快察覺到中央的用意，2月9日，王家烈給廣州的電報，稱：「貴陽之中央軍大部仍未推進，只以一部駐守烏江口，絕無進攻之準備，此中剿匪計劃，不啻隔岸觀火，匪軍因此遽得從容佈置之機。」¹⁶⁸

另一方面，為試探彼此態度，薛岳組織一赴南寧連絡團，由團長蕭文率領，到廣西拜訪桂系要員。¹⁶⁹廣西隨後也派廖磊隨蕭文回貴陽，拜訪薛岳等人。2月2日，薛岳致電蔣中正，告以下列幾點：

（甲）據蕭文回報：

（一）桂防我襲柳州，故桂柳均加強工事。

（二）桂防我佔有貴州，用種種方法使我離黔。

（三）桂欲利用剿匪名義，推進而佔有貴州

（乙）蕭文赴桂，私求粵桂各助四軍五萬元，極為不對。

（丙）廖磊偕蕭文到黔，意欲我軍早離貴陽，向川追剿。

（丁）王紹武與粵桂勾結甚密，職對粵桂軍用極誠懇態度應付，務使我軍確實把握貴州，以為西南軍事據點。¹⁷⁰

多年後，萬耀煌回憶當時向廖言：「現在內有共匪，外有日禍，國內應該團結一致。」廖說：「白健生（白崇禧）並沒有與中央不合作，大家都應該開誠佈公，你們不妨去桂林談談。」萬此時卻反擊：「我去桂林談的也是冠冕堂皇的

¹⁶⁷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9冊（臺北：國史館，2007年），頁278-281。

¹⁶⁸ 胡羽高編，《共匪西竄記》（貴陽：羽高書店，1946年），頁328。

¹⁶⁹ 「薛岳電蔣中正據派赴南寧連絡團長蕭文電稱粵桂軍願與中央部隊一致推進剿匪共同奠定川局及李宗仁擬俟部隊集中即赴前方負責等情」（1935年1月25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202-100。

¹⁷⁰ 「蔣中正電薛岳欣慰江西東北匪首方志敏等已全數剿盡」（1935年2月1日），〈親批文件—民國二十四年二月至民國二十四年八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70100-00041-001。

話，不會有用。」結果是不歡而散。¹⁷¹而廖在返回南寧後的報告指出，「中央軍現駐貴陽及其附近，並無追剿共匪之意。薛岳甚刻苦努力，但已一變為極圓滑之人」。¹⁷²可見雙方都缺乏對彼此的信任。2月7日，白崇禧與黃旭初、廖磊、夏威、劉斐等討論貴州問題後，「認為中央軍若不離貴陽，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任何方面，我皆感受極大之威脅，必須設法去之」。¹⁷³而薛岳也在10日致電陳濟棠：「現匪部退竄黔北，本路軍正分頭追擊，我兄卹鄰濟難，赴義興師，會同桂軍，連江西上，電訊傳來，全軍為之一壯，自當勵飭所部，伏道歡迎，以與我兩粵健兒，聯袂馳騁，共掃妖氛，挽川黔累卵之危，抒黨國西陲之慮。」¹⁷⁴這封讀來看似歡迎的電報，似乎也是向兩廣暗示中央軍已有所防備。

不過，胡漢民等人此時仍在積極鼓動兩廣出兵，2月15日，胡氏電陳濟棠、李宗仁：

兩粵剿共之師依前進行，最所欽佩。蓋此舉關係全局，雖為寧方所不喜，然內有以維繫人心，外可以樹立聲勢。若中道而止，則譽望俱失，且示人以弱，適增其覬覦窺伺之心。而好我如滇、黔，從此必誤其傾向，並使他方得制我經濟財政之命脈。以兩兄之明，已深辨其得失利害者矣。弟於舊臘曾致電王亮偉〔疇，王寵惠〕，使為蔣言「挽救時局，莫如剿共之責委之西南，而立補助之，自己騰出力量以應外變。」王覆電謂然，卻未知蔣對此云何？¹⁷⁵

然而一如既往，因為根本問題仍出在陳濟棠態度的搖擺不定。幾天後，胡漢民在給陳融的信中就抱怨陳濟棠畏首畏尾，「出師事祇不遽行推翻，使人尚有話可說算了罷」。¹⁷⁶陳濟棠與桂系、元老派的步調顯然不一致，出兵北上的計畫又暫告中輟。2月19日，李宗仁由廣州返回南寧後，隨即召集幹部討論對貴州的

¹⁷¹ 郭廷以校閱，沈雲龍訪問，賈廷詩、夏沛然、周道瞻、陳存恭記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頁346。

¹⁷² 黃旭初，《黃旭初日記》，2月6日，南寧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

¹⁷³ 黃旭初，《黃旭初日記》，2月7日。

¹⁷⁴ 胡羽高編，《共匪西竄記》，頁330。

¹⁷⁵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6冊，頁441。

¹⁷⁶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6冊，頁443。

問題，但並未討論出積極有效對策，「結論祇有拖之一法」。¹⁷⁷ 20日晚上，李宗仁再次召開會議，白崇禧認為「祇有自己努力最可靠」。¹⁷⁸ 因為陳濟棠在出兵一事上的消極，廣西也難以單獨打開局面，似乎已經暫時放棄出兵計畫。

但到了2月底，局勢再起變化。王家烈和中央軍吳奇偉的部隊在黔北遭回竄的紅軍痛擊，婁山關、遵義等地再度丟失，王家烈部和吳奇偉率領的兩個中央師皆遭到嚴重損失，¹⁷⁹ 兩廣又趁機蠢蠢欲動。原本態度消極的陳濟棠此時似乎也有動作，第一集團軍第二軍第六師師長李振良到南寧，告以其部隊仍駐紮柳州。¹⁸⁰ 黃旭初日記雖未談及與李振良商談的內容，但粵軍此時似乎躍躍欲試。蔣中正在3月2日接到薛岳來電，稱：

據確報，桂廖（磊）軍長儉（28）日自南寧致王紹武，略稱：「敝軍及粵軍決向前推進，除王贊斌師剋日開赴都勻外，弟亦定日內趕回都勻布置一切等語。」查粵桂軍停止入黔，鈞座迭有明令，此次擅自移動，顯趁赤匪回竄，出師剿匪為名，陰謀盤踞貴州其實，不悉鈞座有無命令，並應如何應處，乞示遵。¹⁸¹

蔣批示：「查王家烈迭次不戰而退，恐其與粵桂勾結，故作圈套。」並立刻覆電薛岳：「如粵桂軍果推進，則我軍留駐貴陽部隊，應閉城固守，一面應嚴令周（渾元）縱隊與吳（奇偉）縱隊會攻遵義之匪，然後再言其他。此時對於王家烈必須密為注意，並可派員與廖磊聯絡。」¹⁸² 隨即又給了薛一電：「前電關於對貴軍處置閉城固守辦法，事前切勿慌忙，務希沉著應付，尤須嚴防貴陽城內雜部，秘密籌畫，不可稍露行跡。此時仍以先破赤匪為要也。」再去電給人在廣州的蔣伯誠：「據王紹武稱：『廖軍長略謂：敝軍及粵軍決向前推進，除王贊斌師

¹⁷⁷ 黃旭初，《黃旭初日記》，2月19日。

¹⁷⁸ 黃旭初，《黃旭初日記》，2月20日。

¹⁷⁹ 貴州軍閥史研究會、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貴州軍閥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58-360。

¹⁸⁰ 黃旭初，《黃旭初日記》，3月1日。

¹⁸¹ 「薛岳電蔣中正粵桂軍擅自移動顯係以剿共為名陰謀盤踞貴州」（1935年3月1日），〈革命文獻—剿共（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200-00029-048。

¹⁸² 「薛岳電蔣中正粵桂軍擅自移動顯係以剿共為名陰謀盤踞貴州」（1935年3月1日），〈革命文獻—剿共（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200-00029-048。

剋日開赴都勻外，弟亦定日內趕回都勻布置一切等語。』據兄來電，稱伯南已令粵軍班師回粵。其實情如何，希詳詢即覆。」又電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據王家烈消息，貴軍已於儉（28）日動員向都勻前進。其或乘匪回竄之機打劫，亦未可知。但據伯誠儉電稱，伯南已令在桂粵軍班師云。未知其實情如何，請與墨三（顧祝同）兄詳商之。」¹⁸³ 並且以軍政部的名義，電令兩廣撤軍。¹⁸⁴ 一天之內發多封電報，可見蔣對粵桂兩省出兵的消息極為重視，且蔣此時已經對王家烈產生相當的不滿與懷疑了。

3月2日，蔣也由漢口飛抵重慶，打算親自督導西南剿共戰事。¹⁸⁵ 這是蔣中正第一次進入四川，也是近代以來，首次有國家領導人進入四川，象徵意義極大。蔣飛重慶，除了指揮剿共戰事，也有警告粵桂切勿輕舉妄動之意涵在。次日，即電令各部隊：「本委員長已進駐重慶，凡我駐川、黔各軍，概由本委員長統一指揮，如無本委員長下令，不得擅自進退，務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¹⁸⁶

由於剿共軍此次在黔北的失利，粵桂再度向中央請纓北上，大批軍隊調往黔桂邊境，時局頗為緊張。且蔣中正屢屢收到王家烈與兩廣暗中往來之報告，加深了他撤換王家烈的決心。3月3日，王家烈為黔北軍事失利一事，在新場向中央自請處分，但因黔軍傷亡甚大，補給匱乏，仍希望中央補助黔軍給養。¹⁸⁷ 蔣立即指示薛岳給予黔軍一個月十萬的補助。¹⁸⁸ 不過，王家烈在向蔣請求補助的

¹⁸³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0冊，頁21。

¹⁸⁴ 貴州軍閥史研究會、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著，《貴州軍閥史》，頁366。

¹⁸⁵ 蔣在日記中提及：「朱匪陷遵義，桂逆思逞貴州，局勢嚴重，故直飛重慶鎮攝。」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0冊，頁20；《蔣中正日記》，1935年3月2日。

¹⁸⁶ 「國民革命軍建軍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建軍史第二部：安內與攘外（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年），頁1019-1020。

¹⁸⁷ 「王家烈電蔣中正殘匪回竄黔當其衝職疏於防守請明令議處現集結兵力撤至新場收容整頓本部經此鉅創款彈兩缺官兵傷亡尚待整理補充請酌量接濟俾以整編待命前驅」（1935年3月3日），〈武裝叛國（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029-204。

¹⁸⁸ 「蔣中正電薛岳於剿匪期間允每月撥王家烈餉項川鈔十萬元並囑其維持軍紀努力進剿」（1935年3月7日），〈一般資料—手稿錄底（二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416-082。

同時，也向兩廣聯繫，請求陳濟棠補充武器給其軍隊，且要求李宗仁、白崇禧迅速派兵入黔，¹⁸⁹引起蔣的不滿。3月中，蔣派李仲公往見王家烈，指責王暗結粵桂，圖謀抵制中央，並要求其交出軍權，專任省主席職務，但王家烈卻以戰事在即，不便臨時卸除軍職為由推託。¹⁹⁰

三、貴州省省政改組

3月24日，蔣中正由重慶飛往貴陽督剿，事先外界並不知情，而貴陽城內當天戒備頗為森嚴。¹⁹¹蔣到貴陽後，開始積極籌備改組貴州省政府事宜。當時城內出現不少反中央的輿論，例如貴州省婦女會所辦的一份副刊《驚蟄》原為宣傳婦女運動的刊物，但在1935年3月份第四十一期中，竟出現一篇〈希特勒陛下〉的文章，內容歷數蔣背叛革命，血腥鎮壓人民群眾，禍國禍民等「罪行」；而其他幾篇文章也都是主張堅決抗日，反對投降，反對法西斯統治的言論；¹⁹²甚至還出現打倒蔣中正及中央諸多軍政要員的傳單散播。蔣拿到傳單後到王家烈面前質問，王氏迫於壓力，當場應允辭去省主席職務。

3月底4月初，紅軍四渡赤水，占領息烽等地，且逼近貴陽，由於貴陽兵力

¹⁸⁹ 「戴笠電蔣中正據港電稱黔王家烈向陳濟棠請求補助械彈而陳濟棠允撥舊槍三千桿但無交付日期」（1935年3月16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214-074。

¹⁹⁰ 陳紅民主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4冊，頁136；嚴平，〈平剛日記選輯（續二）〉，1935年3月13日，《貴州文史叢刊》，1983年第1期，頁45。

¹⁹¹ 蔣飛抵貴陽當天，戒備森嚴，《平剛日記》記載：「見各家懸國旗，沿途加有戴盆帽之兵，荷槍林立，知有異。時又見其遇人槍林立則搜檢身上，無論男女。到桑家坐，聞昨謠言，今日不許人上街，於是擔水者連夜不絕，有賣至一吊錢者。蓋為近日忽無故關城，忽截斷一節不許人行。由是種種無意識之舉動甚多，故致謠言易起也。此皆當局者幼稚不諳事故之過。」嚴平，〈平剛日記選輯（續二）〉，1935年3月24日，《貴州文史叢刊》，1983年第1期，頁45；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0冊，頁194。

¹⁹² 王家烈妻子萬淑芬曾被貴州省婦女會推舉為名譽理事長。陳明仙，〈我所知道的國民黨貴州黨務〉，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135-136。

薄弱，蔣急調滇軍孫渡、桂軍廖磊等部隊星夜馳援，才使貴陽轉危為安。¹⁹³ 4月3日，蔣在給陳誠、何應欽的電報提及：「此間兵力實感不足。匪於三十日以主力乘虛偷渡烏江南岸，即攻息烽。當時息烽只有一營部與一連之兵憑守碉堡，又抽貴陽守兵一營赴援，匪未得逞，乃向東南方紫江進竄，幸遵義李抱冰（李韞珩）部如限奉調到達黑龍廟時，已被匪佔領，立時奪回，乃得斷其南竄之路，匪不得已又向息烽西北之盤龍山、九庄轉至石洞，進擾貴息大道、底寨、陽朗壩、狗場各站，皆被陷，再抽貴陽守備隊一營，進駐紮佐防守，至此貴陽守備隊實不足五營之數，四日之內，竟無一兵可調，直至本日第九十二師與第九十師先後由黔西三重堰堤趕至鎮西衛與修文之間，乃得轉危為安。我第五十三師本午已將息烽以南之匪擊潰。」¹⁹⁴ 王家烈的請辭因此多了幾天緩衝，他仍圖做最後掙扎，希冀能由其妻萬淑芬代理省主席，因此萬氏五次試圖與宋美齡見面，但皆遭到拒絕。¹⁹⁵ 王家烈所做的最後努力失敗。

4月3日，蔣中正電何應欽：「貴州吏治，首須整頓，專員與縣長為尤重要。兄心中有否能實幹苦幹之人員，請保荐數人。」又電黃紹竑：「請兄保荐督察專員一二人來黔候用，須則其有經驗，次論能力可也。」又電熊式輝：「速電張篤倫¹⁹⁶來黔任鎮遠專員，黔東公路與軍事吏治皆比他處要緊，望即照調。」¹⁹⁷ 5日，蔣又電駐贛綏靖主任顧祝同和熊式輝：「貴陽非設行營不可，墨三（顧祝同）兄應先準備來筑，機關重要人員亦可帶來，屆時准派飛機來接。」又電中央駐雲南代表黃實¹⁹⁸：「黔政急宜整理，否則剿匪難有成效。紹武辭意懇切，決辭

¹⁹³ 嚴平，〈平剛日記選輯（續二）〉，1935年3月29日、4月2、4日，《貴州文史叢刊》，1983年第1期，頁45-46。

¹⁹⁴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0冊，頁321-322。

¹⁹⁵ 嚴平，〈平剛日記選輯（續二）〉，1935年4月8日，《貴州文史叢刊》，1983年第1期，頁45。

¹⁹⁶ 張篤倫，字伯常，湖北安陸人，保定軍校畢業。1926年11月，任漢口特別市公安局局長，旋即兼漢口市市長。1929年，任陸軍第五路軍第九軍副軍長。1932年6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旋調蒙藏委員會委員。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0冊，頁671。

¹⁹⁷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0冊，頁323。

¹⁹⁸ 黃實，字衡秋，北京陸軍速成學校，雲南講武堂畢業。歷任江西省兼財政廳廳長、第五路軍總指揮部總參謀長、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國國民黨第三屆候補中央

去主席職，專帶軍隊，故中央擬改組政府。如果改組時，志舟（龍雲）主席如有得力人員，請其先行密示，以便保任。」¹⁹⁹可見蔣對改組黔省已經箭在弦上。6日王家烈正式向中央請辭省主席職務，11日批示通過。²⁰⁰隨後，薛岳、晏道剛等人又大幅減少王家烈所部軍餉，²⁰¹並收買其旗下師長何知重、柏輝章等人，讓他們向王鬧餉，逼迫王下台，王最終又被迫辭去軍長職務，隨即改任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所部第二十五軍被改編為五個師。到了6月以後，這五個師都被調離貴州〔按：至抗戰前共整編為四個師、一獨立旅〕。²⁰²4月底，行政院又頒布命令，免去猶國才、鄭先辛、劉民傑、侯之擔等人的省政府委員、各廳廳長等本兼職務。²⁰³至此，貴州終於結束多年來的半獨立狀態。

不過，儘管著手黔省政府改組及軍隊的改編，最大的問題仍是桂系陳兵於黔南，該如何使之退出。蔣中正在飛抵貴陽不久後，曾電邀李宗仁來貴陽會面，但李認為蔣無誠意，又不好直接拒絕，且為取信陳濟棠，乃前往廣州，但是仍派出張定璠、劉斐去貴陽與蔣會晤。4月4日，張、劉二人返抵南寧，回報蔣中正的三點意見：（一）高級文武官員應請中央任命；（二）絕不以經濟及武力害桂；

執行委員、中國國民黨第四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此時為中央駐雲南代表。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0冊，頁673。

¹⁹⁹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0冊，頁343。

²⁰⁰ 「貴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等為懇請辭去省主席兼職」（1935年4月9日），〈貴州省政府官員任免（四）〉，《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32220-00196-021。

²⁰¹ 當時中央每月撥給第二十五軍的十萬元軍餉，由薛岳處置。薛只將部分給予王家烈所部，其餘分別給予其他師長，以收買與分化王家烈的部下。嚴平，〈平剛日記選輯（續二）〉，1935年3月29日，《貴州文史叢刊》，1983年第1期，頁45-46。

²⁰² 第二十五軍第一師何知重部被改編為第一〇三師、第二師柏輝章部被改編為第一〇二師、第三師吳劍平部被改編為第一二一師、教導師被改編為新編第二十五師，後改為第一四〇師、第四旅被改編為新編第十一師，後改為陸軍獨立第六旅。王家烈，〈桐梓系統治貴州的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頁33；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2年），頁411-412、416、421、435；李寶明，《國民革命軍陸軍沿革史》（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5、67、431。

²⁰³ 〈奉令貴州省政府委員猶國才等均免職任命曹經沅等為貴州省政府等職〉，《貴州省政府公報》，第1期（1935年10月），頁21。

（三）望共同剿共。並提及蔣對白崇禧親筆來函，又派出劉斐等來見，且派兵至馬場坪協剿而深表欣慰。張定璠因而建議，當趁此時機向西南政務委員會提案，由該會授權李宗仁與蔣中正商洽貴州剿共事宜，如同當初授權陳濟棠與蔣洽商江西剿共那樣，此意見獲得白崇禧、黃旭初、葉琪、王公度等人同意。7日，張、劉前往廣州，向李宗仁報告在貴陽與蔣會面的經過，並轉述白崇禧等人的意見。12日，廣西方面收到消息，李宗仁贊同彼等之意見，已經致電蔣中正該項提議。不過，因貴陽局勢已經好轉，黃旭初等在15日收到蔣的覆電，認為竄至龍里、貴定的紅軍已經潰敗，廣西無須出兵，渠等提議為蔣拒絕，黃旭初遂批評蔣「自做偽報」。²⁰⁴

4月16日，蔣中正收到情報，確認粵桂不同調，陳濟棠並不贊同白崇禧向貴州進兵的主張。²⁰⁵ 如此一來，廣西勢難有所作為。另一方面，為緩和桂系對改組貴州省政府的疑慮，蔣也相當程度採納廣西開出的條件，不但任命與李、白關係素來良好的吳忠信為省主席，且任命廣西指定的七名人選為省政府委員，又對進入黔南的桂軍提供六十萬元補助，²⁰⁶ 終於使黔南的桂軍撤回廣西。至此，貴州完全落入中央控制，兩廣對貴州的拉攏以失敗告終。

伍、結論

自1932年西南兩機關成立以來，即標榜「均權共治」原則，對西南各省希冀「以西南結西南」，並憑藉各省團結合作，完成「抗日」、「剿共」和「打倒獨裁」的理想。西南兩機關成立之初號稱有監督指揮廣東、廣西、福建、雲南、貴州五省的軍政、黨務、財政、行政、教育、司法、交通、實業等各方面之權力，

²⁰⁴ 《黃旭初日記》，1935年3月27、28日、4月4、6、12、15日。

²⁰⁵ 「甯克烈電蔣中正粵桂援黔主張各不同白崇禧堅持粵四五師向黔推進陳濟棠未同意李漢魂已返粵解決等文電日報表等二則」（1935年4月16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二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450-089。

²⁰⁶ 〈第3、蔣介石の対西南政策〉，收錄於「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j/meta/image_C11110581600?IS_KEY_S1=C11110581600&IS_KIND=SimpleSummary&IS_STYLE=default&IS_TAG_S1=InD&（2020/4/29點閱）。

然而僅有兩廣較為受其號令，實際上是個頗為鬆散的架構。

理想和現實往往有巨大的鴻溝。以素來最親兩廣的貴州來考察，其內部派系眾多，各方利益不一，彼此爾虞我詐，使得「以西南結西南」的理想徒託空言。一牽涉現實利益，各實力派最關注的還是自己的實力、地盤、軍隊。儘管胡漢民、李宗仁等人不斷對貴州各方領導人物曉以大義，勸說毛光翔、王家烈、猶國才等放下對彼此的成見，努力實現精誠團結；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兩廣本身又缺乏足夠的力量來制止貴州歷來的內部紛爭，何況貴州內部紛爭總與周圍數省和中央有所牽連，最後導致貴州在數年內戰中徒然消耗大量資源，不但談不上「以西南結西南」，反而使貴州財政瀕臨破產邊緣。²⁰⁷直到1934年紅軍大規模進入貴州之時，各派才走向合作，但顯然已經太晚，最終被中央軍趁虛而入，結束貴州的半獨立狀態。而如果連最親近兩廣的貴州在落實「以西南結西南」的策略時都如此不理想，其他省份對於兩廣所標榜的崇高理念，只怕更難有實踐的可能了，這也註定胡漢民「以西南結西南」的策略和抗日、剿共、反獨裁等理想，難以憑藉各實力派的合作達成。

此外，中央軍進入貴州以後，兩廣政要中雖有不少人主張出兵，但粵方實力派陳濟棠始終畏首畏尾。陳雖在1934年初即提出「西進政策」，主張與滇黔結好，也曾在中央軍即將進入貴州前宣稱不排除出兵的可能，但一旦面臨與中央可能兵戎相見時，又展現消極的態度。正因為陳濟棠這種遲疑不定的心態，使得兩廣出兵計畫多次延宕，不但被中央軍捷足先登，搶占貴陽成功，且桂系之後幾度意圖出兵貴州，也皆因陳的推託而最終無法實現，甚至蔣中正也多次利用陳來牽制桂系和元老派的出兵計畫。對外的無力，及對內不團結，皆是胡漢民等人的理想難以被落實的原因。在中央軍改組貴州省政府後，陳濟棠以紅軍已經遠竄為由，在不顧廣西的反對下，又迅速地把駐柳州、慶遠的粵軍撤回廣東。²⁰⁸廣西

²⁰⁷ 據張學良到貴陽視察後所言：「見人民困苦已極，童年男女有十五、六齡，尚不得一下裳蔽體者，官吏征丁稅急，則貧民往往以子女為代，官吏受而轉鬻諸粵中為奴婢者比比，皆為外間所意想不及者云。」邵元冲著，王仰清、許映湖標註，《邵元冲日記》，頁1243；池炫叡，〈貴州中央化（1926-1935）〉，頁93。

²⁰⁸ 廣西當局擔憂粵軍一撤退，可能影響鴉片輸入，影響經濟，故主張暫緩，還派了葉琪到廣州與李宗仁、陳濟棠洽商，但陳濟棠仍在6月初旬將入桂的第二軍全數撤出。《黃旭初

政要白崇禧、黃紹竑、葉琪等曾開會討論時局，得出結論：「貴州完全被南京所改造，湖南因粵桂貌合神離，自然不會來加入西南團體；雲南甚狡猾，其言不可盡信；廣東太自私。總結起來皆不可恃，惟恃自己發憤圖強。」²⁰⁹可見對陳濟棠相當失望。同年11月的五全大會召開，黃旭初等廣西政要都勸李宗仁北上南京參加，以免「為陳伯南所累死」。²¹⁰時人評論陳濟棠的政治手段云：「倘使他不滿意於南京，便說西南政務委員會的議決如何如何，倘使他要抵抗胡展堂（胡漢民）先生，又說中央的命令怎樣怎樣。要而言之，終他在粵數年，他確有他的神通，雖然不大高明，但也左右逢源，無不如意。」²¹¹可謂一語中的。然而，陳濟棠這樣的性格，也使他只滿足維持現有地盤，不願配合元老派和桂系領導人冒險打開新局面。粵桂之間因彼此利害不同，也註定雙方聯合反蔣局面難以成功。

相反地，中央對於貴州，最初雖然顯得鞭長莫及，在歷次貴州內戰時，基本採取放任的態度，只能依靠較親近中央的實力派龍雲、劉湘等代為設法善後，但已能有效牽制貴州內部各派的力量，不使其中一派過分強大。到了1935年年初，中央還能利用紅軍西竄之際，迅速進入貴陽，並趁王家烈財政困難、軍事失利時，順勢解除王家烈的政權、兵權，改組貴州省政府和改編省內軍隊，將貴州逐步納入中央控制，使兩廣失去一個潛在盟友。隨著剿共的進行，中央的力量又進一步滲入以前難以控制的西南各省，將力量逐漸深入四川，對西南各省的中央化取得了不小的進展。中央化的增強，也奠定日後抗戰的大後方基礎，該年8月11日，蔣中正在峨眉軍官訓練團的總理紀念週上演講「川滇黔三省的革命歷史與本團團員的責任」時，宣稱：「我敢說：我們本部十八省那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的強敵，恢復一切的失地，復興國家，完成革命！」²¹²中央力量逐步進入川滇黔三省，對後來抗戰的發展極為

日記》，1935年5月13日；黃旭初，〈寧夏對峙期間的粵桂關係〉，收入黃旭初原著，蔡登山主編，《黃旭初回憶錄：抗戰前、中、後的廣西》（臺北：獨立作家，2016年），頁41。

²⁰⁹ 《黃旭初日記》，1935年5月6日。

²¹⁰ 《黃旭初日記》，1935年11月7日。

²¹¹ 陳公博，《苦笑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頁223。

²¹²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2冊（臺北：國史館，2008年），頁213-214。

重要。如果沒有這麼一個大後方，很難想像國民政府可以維持抗戰態勢達八年之久。

1934年以後，隨著閩變解決、第五次圍剿奏效，福建、江西先後為中央軍所控制，1935年後貴州又被納入中央的勢力範圍，兩廣面臨被中央三面包圍的態勢，其政治舞台日益縮小。1936年5月，胡漢民突然因腦溢血於廣州逝世；6月，兩廣事變爆發，雖然聲勢浩蕩，但缺乏元老派支持的兩廣很快就人心渙散、土崩瓦解；7月，中央下令撤銷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兩機關，廣東陳濟棠下野後出洋；9月，廣西李宗仁、白崇禧也宣布服從中央號令，兩廣終於宣告統一，以西南兩機關為架構的兩廣反蔣局面亦步入終結。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貴州毛光翔王家烈二部戰爭案〉。

〈貴州省政府官員任免（三）〉。

〈貴州省政府官員任免（四）〉。

〈粵桂政變情報（一）〉。

《黃旭初日記》（南寧，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

《蔣中正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資料—手稿錄底（十七）〉。

〈一般資料—手稿錄底（二十一）〉。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三）〉。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七）〉。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九）〉。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十二）〉。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三）〉。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五）〉。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十三）〉。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十五）〉。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十七）〉。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十九）〉。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二十二）〉。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三年（四十二）〉。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三年（五十二）〉。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四）〉。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七）〉。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十六）〉。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二十三）〉

〈武裝叛國（六）〉。

〈革命文獻一剿共（六）〉。

〈積極治邊（二）〉。

〈親批文件—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至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

〈親批文件—民國二十四年二月至民國二十四年八月〉。

《閻錫山史料》（臺北，國史館藏）

〈各方民國21年1月往來電文錄存（三）〉。

〈各方民國21年1月往來電文錄存（四）〉。

〈各方民國24年1月往來電文錄存（一）〉。

二、史料彙編

〈王猶之戰檔案史料一組〉，《貴州檔案史料》，1987年第1期（1987年〔月份不明〕）。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0冊。臺北：國史館，2005年。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2冊。臺北：國史館，2008年。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8冊。臺北：國史館，2005年。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9冊。臺北：國史館，2007年。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0冊。臺北：國史館，2008年。

陳紅民編著，《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2至14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三、回憶錄、訪談錄、日記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冊。北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0年。

王亞明，〈如煙往事念李桑〉，《貴州文獻》，第6期（1980年2月）。

- 王家烈，〈桐梓系統治貴州的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貴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63年。
- 王家烈，〈貴州桐梓系軍閥與新桂系軍閥的關係〉，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西文史資料》，第九輯。南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1年。
- 吳道安，〈解放前貴州政局演變概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
- 周素園，〈貴州陸軍史概要〉，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61年。
- 邵元冲著，王仰清、許映湖標註，《邵元冲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胡羽高編，《共匪西竄記》。貴陽：羽高書店，1946年。
- 張志韓，〈何夫人王文湘女士行誼〉，《貴州文獻》，第11期（1986年1月）。
- 張鏡影，〈周西成傳初稿〉，《貴州文獻》，復刊第5期（1978年2月）。
- 郭廷以校閱，沈雲龍訪問，賈廷詩、夏沛然、周道瞻、陳存恭記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 陳公博，《苦笑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
- 陳明仙，〈我所知道的國民黨貴州黨務〉，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
- 陳紅民，〈秘書眼中的胡漢民—王養冲教授訪談〉，《檔案與史學》，1999年第2期（1999年3月）。
- 黃旭初原著，蔡登山主編，《黃旭初回憶錄：抗戰前、中、後的廣西》。臺北：獨立作家，2016年。
- 薛岳，《剿匪紀實》。臺北：文星書店，1972年。
- 嚴平，〈平剛日記選輯（續二）〉，《貴州文史叢刊》，1983年第1期（1983年9月）。

四、公報、雜誌、報紙

- 《上海商報》，上海，1932-1933年。
《大公報》，天津，1932、1934年。
《中央時事週報》，南京，1934年。
《民報》，上海，1934年。
《申報》，上海，1932-1934年。
《申報月刊》，南京，1935年。
《夜報》，上海，1933年。
《社會日報》，上海，1933年。
《時代日報》，上海，1933年。
《貴州省政府公報》，貴陽，1935年。
《新聞報》，上海，1932、1934年。

五、專書

- 「國民革命軍建軍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建軍史第二部：安內與攘外（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年。
- 王俯民編著，《民國軍人志》。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
- 李寶明，《國民革命軍陸軍沿革史》。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周春元、何長鳳、張祥光主編，《貴州近代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
- 陳紅民，《函電裡的人際關係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局，2003年。
-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臺北：國史館，2002年。
- 陳進金，《機變巧詐：兩湖事變前後軍系互動分析》。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2007年。
- 貴州軍閥史研究會、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貴州軍閥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
- 楊天石，《海外訪史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
- 楊維真，《唐繼堯與西南政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
- 楊維真，《從合作到決裂—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1927-1949）》。臺北：國史館，2000年。
- 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臺北：國防部史政

「以西南結西南」的嘗試與失敗：以貴州政局變化為核心的考察（1932-1935）

編譯室，2002年。

蕭自力，《陳濟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

羅敏，《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係研究（1931-193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六、論文

王宏松，〈蔣中正與粵系二陳（陳銘樞、陳濟棠）關係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王宏松，〈「中央化」的詮釋、實踐與挑戰：以蔣中正對四川的處置為例（1927-1949）〉。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年。

池炫勳，〈貴州中央化（1926-1935）〉。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陳紅民，〈胡漢民·西南政權與廣東實力派（1932-1936）〉，《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1期（2007年1月）。

楊維真，〈剿共與統一——論1935年中央改組貴州省政府事件〉，「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1年10月6-9日。

七、網路資料

〈李仲公〉，收錄於「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查詢」，<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result.php?peopleName=%E6%9D%8E%E4%B%B2%E5%85%AC&searchType=1#1>（2020/2/27點閱）。

〈第3、蒋介石の対西南政策〉，收錄於「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j/meta/image_C11110581600?IS_KEY_S1=C11110581600&IS_KIND=SimpleSummary&IS_STYLE=default&IS_TAG_S1=InD&（2020/4/29點閱）。

〈鄧漢祥〉，收錄於「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查詢」，<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result.php?peopleName=%E9%84%A7%E6%B-C%A2%E7%A5%A5&searchType=1>（2020/2/27點閱）。

